

## 戰時國軍的組織運作與人事問題 ——以第三戰區的將官任免為例

張世瑛

### 摘 要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蔣中正即在全國各地陸續成立十個戰區，並大致維持至抗戰勝利止。其中，第三戰區位處東南菁華地區，抗戰八年期間皆由顧祝同擔任第三戰區司令長官，也是該戰區內擁有最高軍政權力者。長久以來學術界幾乎都將研究焦點放在以蔣中正為核心的最高統帥部，對於地方戰區殊少關注；然而，自抗戰伊始即設立遍及全國的各戰區，其實具有同樣重要的歷史意義。

本文以抗戰時期第三戰區內數起將官任免的人事爭議，做為個案研究，共分為兩個部分。首先，蔣中正曾兩次嘗試調動顧祝同司令長官的職務，臨發布前的最後關頭，卻在人事問題上卡關，以致胎死腹中。第二部分運用1944年初顧祝同欲調動轄下川系第二十三集團軍的兩位師長之職，此舉竟引發內部強烈反彈，一四八師及一四四師上下動用各種抗爭手段強力阻撓，最終甚至演變成兵變事件。從結果來看，此事無疑是戰時最嚴重的違紀事件之一。

造成這幾起人事案重重阻力的原因，以致嚴重傷害戰時國軍的組織運作，都與民國時期人身政治的盛行，以及駐防部隊插足地方商業利益的糾葛密切相關；且抗戰時期的人身政治絕非僅限於蔣中正一人，而是存在於當時國軍將領的一種普遍現象。

關鍵詞：中日戰爭、第三戰區、顧祝同、蔣中正、潘左

# **Organizational Operations and Personnel Issues in the Nationalist Army during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Cases of Senior Appointment and Dismissal in the Third War Zone**

Shih-ying Chang<sup>\*</sup>

## **Abstract**

Shortly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in 1937, head of China's National Military Council, Chiang Kai-shek, divided the country into ten War Zones and kept them to the end of war roughly. The Third War Zone, including Jiangsu, Zhejiang, Fujian, Anhui and Jiangxi provinces, took form in July, 1937, on the eve of Japanese invasion of Shanghai. Ku Chu-tung was its vice commander-in-chief. In law and fact, the military regions were the highest political-military organization in wartime China. Scholars have long focused their research on Chongqing's military leadership headed by Chiang Kai-shek. Few have studied the War Zon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However, the War Zone system establishe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war is also of great contemporary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The present article intends to amend this weakness in existing scholarship by examining a few cases of appointment and dismissal of generals in the Third War Zone in 1943-1944. First of all, Chiang Kai-shek twice attempted to transfer Ku Chu-tung away from the War Zone, yet both attempts were thwarted at the last moment. Moreover, the War Zone's headquarters encountered fierce resistance, even mutinies and defections, in the process of removing the commanders of the 144th Division and 148th Division.

---

<sup>\*</sup> Senior Researcher, Academia Historica

The conflict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evalence of personalized politics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and the commercial entanglement of troops in their stationed areas. These cases reveal that allowing personal connections to interfere in personnel decisions was by no means limited to Chiang Kai-shek; it was a widespread phenomenon in wartime China.

**Keywords:**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The Third War Zone, Ku Chu-tung, Chiang Kai-shek, Pan Zuo



# 戰時國軍的組織運作與人事問題 ——以第三戰區的將官任免為例\*

張世瑛\*\*

## 壹、前言

出版於1993年的張瑞德教授所著《抗戰時期的國軍人事》，詳細論述戰時國軍的任免、升遷調補、獎懲考績、待遇福利、退役撫卹等人事制度運作，直到現在仍是研究戰時國軍人事制度必須參考的開山之作。不過，由於中國幅員遼闊，各地情況差異甚大，例如以人事晉用條件而言，中央軍與地方軍的標準即不相同：「中央軍由於流動性較大，因此主官引用故舊、同學、學生的情形較多，而地方部隊由於鄉土色彩較濃，用人常以血緣、地緣關係為主。」<sup>1</sup>顯示各部隊間的人事運作，絕不是鐵板一塊，軍事委員會所擬訂的各項人事制度，能否順利地一體推行至全國各地，不免讓人打上問號。

即使是黃埔軍校畢業的天子門生，也不如我們所想的那般認可國軍的人事升遷標準，許多人即對軍事委員會的用人不公頗有微詞，以黃埔一期的陳明仁

---

\* 本文係行政院科技部補助「抗戰時期的第三戰區——兼論國民政府的戰時軍事體制」專題研究計畫（計畫編號：MOST 103-2410-H-292-002-）之部分研究成果。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修正意見，謹深致謝忱。

收稿日期：2020年9月17日；通過刊登日期：2020年12月24日（按：依編輯委員會議「同一作者刊出之論文，以同年度不刊登2篇為原則」辦理）。

\*\* 國史館纂修

<sup>1</sup> 張瑞德，《抗戰時期的國軍人事》（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頁51。

為例，抗戰時期他就因為自己不是浙江籍，以致多次與升遷失之交臂而屢屢抱怨。<sup>2</sup> 陳明仁的說法雖不免偏激，卻絕非孤例。軍隊是一個講求高度服從的封閉式群體，絕不容許有太多個人意見的存在，更遑論挑戰上級的領導權威。然而綜觀整個民國時期，因欠薪、索餉、反抗命令、糾眾鬧事等各種原因而引發的兵變現象，可說是不絕如縷；<sup>3</sup> 1928年底國民政府名義上統一中國，兵變情況雖有好轉，但挾兵自重、反抗中央的現象，始終沒有根絕。

中日戰爭的爆發，對於各方面條件都處於劣勢的國軍來說，雖是一次嚴重的打擊，卻也是一次難得的契機，如何在砲火洗禮過程中逐步走上制度化與現代化的道路，無疑是領導中樞所冀圖達成的建軍目標。過去學界有關抗戰時期國軍人事體制的研究，多稱許戰前原有的地方實力派，響應一致抗戰呼籲，而逐漸歸順中央，國民政府勢力因此深入戰前鞭長莫及的川滇黔等西南地區。前述張瑞德教授的研究，即肯定戰時國軍在歷經擴編、混編及互調的過程中，黃埔學生勢力大幅擴張，完成軍界的接班部署，實現了中央化的目標，不但國軍素質提昇，也為國家的統一與軍隊國家化奠定基礎。<sup>4</sup>

然而，在戰時國軍中央化的表面之下，卻也同時滋生另一個矛盾的現象。中央在南京十年期間悉心培植的精銳之師，在抗戰的前半年內即已傷亡殆盡，而絕大多數的地方軍系卻因未參與戰事，得以保全實力，雙方軍力對比明顯此消彼長。國民政府此後反倒必須仰其鼻息，才能繼續抗戰，一批原先與南京中央貌合神離的地方軍事將領藉抗戰之機坐大，甚至藉身居戰區司令長官等高位，形成新的軍閥割據局面，嚴重侵蝕國府的統治根基。<sup>5</sup>

<sup>2</sup> 陳明仁曾憤慨地說：「以我對黨國的功勳勞績，不亞於任何一個黃埔一期生，所差者，不是浙江籍而已。他人可做總司令，而我做一副軍長都不行，未免太不公平。」參見陳明仁，《陳明仁日記》（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17年），1939年10月30日，頁208。

<sup>3</sup> 有關民國時期的兵變情形，最完整的史料參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兵變》（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年）。

<sup>4</sup> 張瑞德，《抗戰時期的國軍人事》，頁129-130。

<sup>5</sup> 齊錫生，〈抗戰中的軍事〉，收入許倬雲、丘宏達主編，《抗戰勝利的代價》（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6年），頁8-9；Hsi-sheng 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1937-45*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2), pp. 205-217.

如何回應這兩個同時存在的矛盾現象，本文將選擇以抗戰時期第三戰區內數起人事任免的爭議案例，做為個案研究的取樣對象，為避免本文討論對象的定義不夠精確，鑒於本文所討論的所有案例，當事人至少都是將級軍官（少將以上），故以「將官任免」一詞來涵攝本文討論的所有對象。而在章節架構的安排上，共分為兩個部分來進行，第一部分為領導中樞曾兩次嘗試調動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的職務，都已經到了對外發布的最後關頭，但最後都在人事問題上卡關，以致胎死腹中、重回原點。第二部分將探討顧祝同對轄下川軍系統第二十三集團軍的兩起師長派任案，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長期以來極少介入該集團軍的人事派免，若非這次的師長人事調整，極難一窺國軍內部地方軍系盤根錯節的派系與人事癥結。1944年初，顧祝同出手調動該集團軍的兩位師長職務，引起內部的強烈反彈，川軍上下動用了各種抗爭手段，阻撓這兩起人事案，最終爆發了兵戎相向的兵變事件，甚至集體倒戈至汪精衛政權陣營。從結果來看，此事無疑是戰時最嚴重的違紀事件之一，也對重慶國府一直努力的「軍隊國家化」目標，打了重重的一個耳光。

過去鮮少有學者關注這幾起人事派免案例，這或許是因為以往學界泰半都將研究焦點集中於位在重慶的國軍領導中樞，然而如果我們從地方史的角度出發，第三戰區轄境下的東南五省，無疑是戰前國民政府扎根最深的權力基礎與勢力範圍。抗戰爆發後國軍主力雖逐步撤退至西南大後方，仍在東南五省留下相當數量的部隊。以往的研究均將顧祝同的第三戰區，視為蔣中正所能直接掌握的地區，透過本文這幾起案例的觀察，不僅可以瞭解前線戰區的內部運作，更可藉此一窺戰時重慶中央與前線大員、地方軍政首長與地方軍系將領的兩重統御關係，將有助於我們重新審視戰時國軍人事的結構性問題。<sup>6</sup>

<sup>6</sup> 軍中是一個講求服從、等級森嚴的封閉體系，尤其在戰爭時期負實際領導統御之責的軍、師長，相較於幕僚及後勤軍官，更擁有無上的權力。對此熊式輝曾評論道：「軍師長自視為天之驕子，有恃無恐……難於層層節制。」參見熊式輝，《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香港：明鏡出版社，2008年），頁416。



## 貳、第三戰區的設置經過與組織編制

1937年廬溝橋事件爆發後，日方起初仍視為一如往常的地方性衝突，未能及時察覺國民政府自西安事變後，其控制能力已達前所未有之高峰，國內各派政治勢力均在抗日前提下達成共識，以及民眾反日情緒早已沸騰如沛然之勢、莫之能禦。廬溝橋事件後十天，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發表「廬山宣言」談話，尤其是一重要之風向球，蔣向全國民眾宣告國府對於中日戰爭的基本立場：「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的決心。」<sup>7</sup>廬山宣言除了展現國府不惜一戰的決心外，也反映蔣中正早已意識到中日軍力的懸殊，戰火一旦點燃，這場戰爭就是不分畛域、族群、黨派、地區、性別的全民戰爭。

依據戰時法規，國軍指揮體系從上至下，分別是重慶統帥部（軍事委員會），天水（後改為漢中）及桂林行營（軍委會派出），再下是各地戰區。對日作戰曾先後劃設十二個戰區，由於戰區是戰時地方的最高軍政組織，對於既有的省、縣各級行政體系，勢必帶來一定的衝擊，只有充分瞭解戰區的實際運作，才能對戰時國府在地方上的統治，得出較完整的歷史輪廓。

為了有效地整合及運用全國人力、物力資源，以面對這場敵我實力懸殊的戰爭，軍事委員會曾先後在交戰區域內劃設十二個戰區，其中第一戰區至第十戰區屬正面戰場，魯蘇戰區和冀察戰區被規劃為游擊戰場。戰區的劃設始於1937年8月20日，時任國民政府陸海軍司令的蔣中正，於南京召開國防會議，決定將全國劃分為七個戰區。1938年10月武漢會戰結束後，中日雙方正式進入相持階段，國府又陸續調整為十個戰區，並大致維持到抗戰勝利為止：1.第一戰區：重設於1939年1月，作戰地區為河南及安徽一部，程潛、衛立煌、蔣鼎文、陳誠、胡宗南先後任司令長官。2.第二戰區：作戰地區為山西，司令長官為閻錫山。3.第三戰區：作戰地為蘇南、皖南、贛東北及浙、閩兩省，司令長官為顧祝同。

<sup>7</sup> 蔣中正，〈對於廬溝橋事件之嚴正表示〉（1937年7月17日），收入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4卷（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84年），頁585。



4.第四戰區：作戰地區為兩廣地區，廣州淪陷後撤退至廣西，張發奎任司令長官。5.第五戰區：作戰地區為皖西、豫南、鄂北及鄂東，李宗仁任司令長官。6.第六戰區：重設於1940年6月，作戰地區為鄂西、川東及黔東北，陳誠任司令長官。7.第七戰區：1940年7月由第四戰區分出，作戰地區為廣東，余漢謀任司令長官。8.第八戰區：作戰地區甘肅、寧夏及青海，朱紹良任司令長官。9.第九戰區：作戰地區鄂南（長江以南）、湘北及贛西，薛岳任司令長官。10.第十戰區：作戰地區為陝西，蔣鼎文任司令長官。<sup>8</sup> 除了此十個負有正面會戰任務的戰區外，國軍因應戰地情勢的變化，在日軍勢力深入的交錯區域，設置兩個以游擊戰為主的戰區，分別為：1.魯蘇戰區：設於1939年1月，作戰地區為蘇北、魯南，于學忠任總司令，1944年5月撤銷。2.冀察戰區：設於1939年1月，作戰地區為河北、察哈爾，鹿鍾麟、衛立煌、蔣鼎文、陳誠先後任或兼任總司令，1945年4月裁撤。在十二個戰區中，只有第二戰區及第七戰區是以山西及廣東單一省份為轄境，其他戰區都橫跨數個省份，而河南、安徽、湖北、江西等省份，甚至被切割成好幾個戰區。

1937年8月，軍事委員會即將國府控制的核心區域——長江三角洲劃歸第三戰區，一開始第三戰區司令長官為馮玉祥，但在以中央軍為主體的作戰體系裡，為安撫馮玉祥所量身打造的此一角色形同虛設，馮完全無法使心向臂地指揮中央軍，只好於9月17日由蔣中正自兼此一職務，顧祝同出任副司令長官。<sup>9</sup> 淞滬會戰結束後，1937年12月20日顧祝同升任第三戰區司令長官。在前後八年間的時間，顧一直長居此位。不過，顧的情況並非特例，戰時各戰區司令長官幾乎都是久任其職的老面孔，像是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第七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及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都是與該戰區的存廢相始終，顯示戰時國軍前線領導層的人事結構，一直是在一個高度穩定、少有變動的狀態。當然，顧祝同能夠應付東

<sup>8</sup> 劉鳳翰，《抗戰期間國軍擴展與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4年），頁47-53。

<sup>9</sup> 淞滬會戰中擔任右翼軍總司令的張發奎說過一件趣事，並表示在淞滬會戰的三個月中，他見到馮玉祥的次數寥寥可數。他說「我清楚地記得這一場景，敵機空襲騷擾時，馮玉祥嚇得跑到野地裡，在指揮部我們都沒有驚惶失措，大家認為這一舉止十分可笑，馮玉祥還一向自吹自擂是個勇士呢！」參見張發奎，《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年），頁238。

南五省位處日軍、汪政權及新四軍勢力犬牙交錯的複雜局面，與其個人特質及領導風格，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sup>10</sup>

抗戰期間第三戰區作戰指揮系統下主要有四支集團軍，分別為川軍第二十三集團軍唐式遵部、湘軍第十集團軍劉建緒部，以及北伐期間從直系孫傳芳部投誠過來的上官雲相及陳儀兩人，前者在武漢會戰期間整合第三戰區下轄部隊編成第三十二集團軍，另福建省主席陳儀身兼戍守在福建地區的第二十五集團軍總司令。除了川軍的第二十三集團軍一直維持封閉的結構，外人很難打入其中，其他三支集團軍在經過抗戰的洗禮後，都在國軍中樞採取人員調動、整編及混編等方式下，逐步成為中央軍的一支；<sup>11</sup> 僅有第二十三集團軍一直保持由川系軍人主導的地方軍系鮮明色彩。

### 叁、不動如山？重慶統帥部對顧祝同的調動嘗試

八年抗戰期間，重慶統帥部曾有兩次試圖調動顧祝同職務的規畫，幾乎都已到了臨門一腳的發布關頭，然而最後卻都不了了之、重回原點。實際上，當顧祝同接到調動訊息時，都在第一時間欣然回覆接受職務調整。換言之，問題可能不在顧祝同身上，而是受到其他的因素干擾。究竟重慶國府在其中所遭遇阻撓為何？在這個過程中是如何運作？為何一起看似單純的人事調動竟困難重重？

#### 一、對調顧祝同與朱紹良的念頭

重慶統帥部第一次起心動念調整顧祝同的第三戰區司令長官職務，據蔣中正自承係受到副參謀總長白崇禧的影響。1938年7月正值武漢會戰酣戰之際，此刻

<sup>10</sup> 丁治磐口述，劉鳳翰訪問，《丁治磐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頁77。

<sup>11</sup> 舉例來說，1941年中陳儀被調任為行政院秘書長，劉建緒轉任福建省主席，劉的第十集團軍總司令職就由黃埔一期的王敬久接任。第三十二集團軍也在1943年由黃埔一期的李默庵接任後，先後被黃埔畢業生予以逐步換血。

「保衛大武漢」的口號雖響徹雲霄，但國民政府早已做好放棄武漢、退守四川大後方的準備。白崇禧認為：「敵人最大企圖，厥為斷我之國際路線，絕我軍械來源，以期戰事早日解決。」一旦國府退守西南，白為蔣所擘畫的抗戰藍圖是：「以川滇為中心，以西北陝甘青寧為左翼，以西南粵桂為右翼……俾國際之援助不致中斷，抗戰之時間可期延長，如能把握此點，則武漢即令有失，將來之作戰仍有勝利希望。」<sup>12</sup>

此時蘇聯是中國實質上的唯一外援，以最迫切需要的空防武力而言，據國軍的統計資料，從1937年10月至1938年底，共有471架蘇聯飛機運抵蘭州，其中輕轟炸機143架、重轟炸機6架、И-16戰鬥機100架、И-15戰鬥機222架。<sup>13</sup> 由於蘇聯援華軍事物資皆從西北交通線涓滴而來，甘肅省會蘭州一躍成為最重要的軍火轉運站與集散地，在歐美國家對中日衝突袖手旁觀之際，蘇聯的軍火供應可說是維繫國軍戰力尚能與日軍拚搏的最後憑藉。因此，僻處邊陲的陝西、甘肅、寧夏、青海四省的國防位置，頓時變得格外重要。

蔣中正立即回電肯定白的建言：「深獲我心」。<sup>14</sup> 此時國府軍政組織在西北地區層級最高的是西安行營，行營主任為蔣鼎文，其次是管轄甘、陝、寧、青四省的第八戰區，戰區司令長官由蔣中正自兼，副司令長官為朱紹良，負實際指揮之責。<sup>15</sup> 此次人事調動一方面是鑒於第八戰區在武漢會戰後勢必扮演更重要的軍火輸運樞紐，必須要派一個最適任的人擔任。但蔣並未明言為何顧祝同比朱紹良更加合適？從資歷及個性來看，兩人皆是國軍將領中的乖乖牌，服從性高，也都

<sup>12</sup> 「白崇禧電蔣中正」（1938年7月30日），〈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七十三）〉，《蔣中正總統文物》（以下簡稱《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500-134。

<sup>13</sup> 王建朗，《抗戰初期的遠東國際關係》（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年），頁195；王正華，《抗戰時期外國對華軍事援助》（臺北：環球書局，1987年），頁114；李嘉谷，《合作與衝突—1931-1945年的中蘇關係》（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85-91。

<sup>14</sup> 「蔣中正電白崇禧」（1938年7月30日），〈領袖指示補編（十三）〉，《蔣檔》，典藏號：002-090106-00013-208。

<sup>15</sup> 朱紹良於1937年11月9日出任新成立的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直到1939年1月14日方升任該戰區司令長官職。參見〈朱紹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國史館藏，典藏號：129-200000-3478。

深得蔣的信任，在蔣的心目中，兩人的位置應難分軒輊。<sup>16</sup> 從目前所能找到的檔案史料中研判，此次顧、朱的對調，起因應是朱紹良多次表達不願續留西北。朱除任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外，並於抗戰前夕兼任甘肅省政府主席一職，然而朱卻與甘省的民政官員間齟齬不斷。據胡宗南的觀察，此刻擔任甘肅省教育廳長的葛武榮，由於其曾任侍從室秘書，深得蔣中正的信任與庇護，葛武榮聯合甘省民政廳長羅貢華等人，在甘省省政上與朱紹良為難。由於葛、羅等人的一再掣肘，以致朱對這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甘省主席之職早萌去意，朱甚至曾向蔣說出不願在甘肅多留一刻的氣話。<sup>17</sup> 另一個較為隱而不顯的因素，則是第八戰區轄下區域，向來是西北回族馬家的勢力範圍，朱與當地的地頭蛇——寧夏省主席兼第十七集軍總司令馬鴻逵等人關係不甚和睦，這可能也是朱紹良想要調職的原因。

另一方面，此次的人事調整，蔣中正也有西安行營與第八戰區在實際運作上的考量。由於管轄地域重疊，時有疊床架屋、互相扞格之虞，為力求軍政組織職權的統一，蔣決定裁撤西安行營，行營所有業務歸併入第八戰區內。於是，蔣中正在1938年8月初迭電顧祝同、朱紹良、蔣鼎文、胡宗南等人，告知此一人事調動訊息，除了將顧祝同及朱紹良對調外，並派賀耀組接任甘肅省主席，在顧祝同尚未抵達西北前，由蔣鼎文暫代第八戰區司令長官職，賀耀組未到蘭州前，則由胡宗南暫代甘肅省主席職。<sup>18</sup>

然而，接下來發生了兩件看似微不足道的人事建議，卻讓整起調動案胎死腹

<sup>16</sup> 表面上顧、朱兩人雖地位相當，但顧祝同早在戰前就已歷任重慶、西安行營主任，八一三淞滬會戰時又先行出任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並以此職務指揮中央兵團總指揮朱紹良進行戰事，不論就資歷、輩分，顧都在朱之上，又得蔣的信任，故合理推測應為更勝過朱的最佳人選。在此感謝匿名審查人的提醒。

<sup>17</sup> 「蔣中正電胡宗南」（1938年8月4日），〈領袖指示補編（十三）〉，《蔣檔》，典藏號：002-090106-00013-216；〈胡宗南電蔣中正〉（1938年8月6日），〈領袖指示補編（十三）〉，《蔣檔》，典藏號：002-090106-00013-099。關於葛武榮的生平經歷，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第二期工兵科畢業，1926年留學日本明治大學經濟系，1928年返國先後曾擔任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委員、寧夏省教育廳長，1934年擔任軍事委員會侍從室秘書，進入蔣中正的幕僚圈。1937年12月17日轉任甘肅省教育廳長。參見〈葛武榮〉，《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典藏號：129-200000-3081。

<sup>18</sup> 「蔣中正電蔣鼎文」（1938年7月31日），〈領袖指示補編（十三）〉，《蔣檔》，典藏號：002-090106-00013-210；「蔣中正電胡宗南」（1938年8月4日），〈籌筆——抗戰時期（十五）〉，《蔣檔》，典藏號：002-010300-00015-011。

中。首先是朱紹良在得知此一調動訊息後，立即向蔣回電，除欣然接受調令外，另就甘肅省政問題，說了一段讓蔣也不明所以、莫測高深的話：「甘省邊情複雜，人事糾紛，謠言眾多，易亂是非，易生扞格。職雖示以大公，加倍努力，已覺束手，正深憂惶，茲蒙體恤，俾輕負荷，感激難名。鈞電剛發，即續有人以明電致此間機關，謂賀（耀組）朱（紹良）對調（按：指甘肅省主席職），府令已決，因此滿城風雨，彈冠相慶，暫維現狀，已感困難……。目下對一六五師整編及隴南張俊耀縮編，稍一停攔，影響重大，擬請即以墨三（按：顧祝同字）兼省主席，一切均臻妥善，否則恐治絲益棼，轉多貽誤。」<sup>19</sup>

朱紹良抱怨甘肅省政的人事紛擾，現今他這顆大石頭還沒走，就已有人敲鑼打鼓、額手稱慶，他雖未明言，但顯然認為賀耀組無法鎮住省內的這群驕兵悍將，建議由顧祝同兼理甘肅省主席，在軍政合一的條件下，才能穩住甘肅局面。蔣中正一開始並不瞭解朱紹良為何一定要顧祝同兼理省主席的用意，蔣的應對之策是派出類似欽差大臣角色的胡宗南，即讓胡以代理甘肅省主席的身分，立刻前往西北，當面詢問朱紹良並調查其間內情。<sup>20</sup>

胡宗南在8月6日向蔣提出調查報告，胡的報告分為兩個重點，首先是如同前述，認為朱一心求去是因為與葛武榮、羅貢華等人的衝突。其次，胡宗南分析了賀耀組不適任的理由，原來在淞滬會戰期間，時任甘肅省主席的朱紹良，曾被調至淞滬前線，擔任右路軍總指揮，故1937年下半年是由賀耀組代理甘省主席一職。如賀回任也算重為馮婦，然而在代理甘省主席任內，胡宗南指賀除有扶植個人軍隊野心外，最重要是他在剿共態度上猶豫不決，致隴東數縣落入中共陝甘寧邊區，且其左右皆為湘籍同鄉軍人，與當地人的關係十分惡劣。<sup>21</sup>

<sup>19</sup> 「朱紹良電蔣中正」（1938年8月2日），〈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七年（四）〉，《蔣檔》，典藏號：002-080200-00284-024；「朱紹良電蔣中正」（1938年8月2日），〈領袖指示補編（十三）〉，《蔣檔》，典藏號：002-090106-00013-213。

<sup>20</sup> 「蔣中正電胡宗南」（1938年8月4日），〈領袖指示補編（十三）〉，《蔣檔》，典藏號：002-090106-00013-216；「蔣中正電胡宗南」（1938年8月4日），〈籌筆—抗戰時期（十五）〉，《蔣檔》，典藏號：002-010300-00015-011。

<sup>21</sup> 胡宗南的報告指稱：「（賀耀組）對共黨態度猶豫，致隴東各屬陷入匪區。其隨從人員多為湘籍軍人，不識大體，故為甘人所恨，亦為諸馬所輕。再長甘政，必致釀成亂階。」參見「胡宗南電蔣中正」（1938年8月6日），〈領袖指示補編（十三）〉，《蔣檔》，典藏號：002-090106-00013-099。



胡宗南對於西北的人事僵局，最後提供給蔣的解方是：「為西北想，則朱（紹良）不可更動，以其能應付外交、壓制共黨、無軍隊野心，僚屬少為惡之人，業為甘人所愛。」<sup>22</sup> 在胡宗南看來，朱紹良雖一再求去，但朱的人格特質與領導風格，卻是能應付西北複雜局面的不二人選。因此，胡建議取消此次的人事調動，仍由朱紹良兼理第八戰區司令長官及甘肅省主席之職。

正當蔣對此陷入長考之際，又出現另一個反彈的阻力。由於這次的人事調整，蔣鼎文將喪失西安行營主任之位，編制上行營的位階高於戰區，蔣鼎文不免心有不甘，他以西北戰略位置重要、民族關係複雜，尤以中共盤踞陝北等各種理由，主張「非以鈞座名義行之，不足以資鎮攝」，並以人事因素，強調：「戰區司令長官編制既不如行營之健全，一旦歸併，以少數人員兼任，深恐力有未逮；行營職員應付西北特殊環境頗有經驗，併入戰區勢難容納，任其向隅，深恐今後戰區應付特殊情形諸感棘手。」<sup>23</sup> 最後，蔣鼎文建議，與其將西安行營併入第八戰區，還不如將第八戰區業務歸併西安行營，方才符合西北現實狀況。

由於蔣中正指示在顧祝同還未到達西北前，由蔣鼎文暫代第八戰區司令長官之職，然而這位一直強調行營比戰區更為重要，且擔任過西安行營主任的人，卻一再表示對於代理新職的誠惶誠恐：「陝甘寧青四省轄區過廣，現內外情勢未見好轉，而以一個戰區主持其間，實有鞭長莫及之勢，應請特予考慮，且墨三兄一時不易到任，八戰區事職暫代主持，職更引為惶懼。」<sup>24</sup> 為了彰顯西安行營的不可或缺，蔣鼎文甚至連流亡難童都搬出來當擋箭牌，原來隨著戰事擴大，難民流離失所，其中不少戰地幼童與父母離散，西安行營在1937年初設立難童收容教養院，至8月初共收容了兩百餘名，蔣鼎文為此特電蔣中正，請示如西安行營裁撤，教養院收容的難童該何去何從？<sup>25</sup>

<sup>22</sup> 「胡宗南電蔣中正」（1938年8月6日），〈領袖指示補編（十三）〉，《蔣檔》，典藏號：002-090106-00013-099。

<sup>23</sup> 「蔣鼎文電蔣中正」（1938年8月4日），〈領袖指示補編（十三）〉，《蔣檔》，典藏號：002-090106-00013-101。

<sup>24</sup> 「蔣鼎文電蔣中正」（1938年8月1日），〈領袖指示補編（十三）〉，《蔣檔》，典藏號：002-090106-00013-211。

<sup>25</sup> 「蔣鼎文電蔣中正」（1938年8月4日），〈領袖指示補編（四）〉，《蔣檔》，典藏號：002-090106-00004-018。西安難童最終是在顧祝同承諾下，同意接任第八戰區司令長

胡宗南的建議已經讓蔣中正重新思考此次人事調動的必要性，蔣鼎文為了西安行營的裁撤，所使出的留難之策，也讓蔣中正不得不予以安撫。在經過一番人事上的角力後，這起人事調動案最終回到原點，顧祝同與朱紹良仍舊續任原職，僅裁撤西安行營。<sup>26</sup>但為了安撫蔣鼎文的情緒，在1939年1月28日另外增設第十戰區，管轄區域僅為陝西一省，由蔣鼎文出任第十戰區司令長官。<sup>27</sup>此時，蔣中正尚未意識到自己在用人政策上只看重資格與關係的盲點，然而在六年後的豫湘桂作戰中，蔣中正將從蔣鼎文身上嚐到苦果。<sup>28</sup>

## 二、調派顧祝同任軍政部次長的盤算

重慶中樞第二次的調動契機則在1941年珍珠港事變後，中美兩國成為戰時盟邦，蔣中正在美方的邀請下，指派江西省主席熊式輝出任駐美軍事代表團團長。<sup>29</sup>至於空出來的江西省主席一職，蔣決定由軍政部政務次長曹浩森接任，將顧祝同調任軍政部政務次長，由重慶衛戍總司令劉峙遞補顧離任後之遺缺。<sup>30</sup>在

---

官後，概括承受收容難童教養院的事務，蔣鼎文才未再提及此事。「顧祝同電蔣中正」（1938年8月11日），〈領袖指示補編（四）〉，《蔣檔》，典藏號：002-090106-00004-039。

<sup>26</sup> 根據蔣中正日記的記載，蔣是到8月25日才下定決心：「西北主持人物應再加考慮決定也」，次日即決定中止此次人事布局。《蔣中正日記》，1939年8月25日、26日，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藏。蔣中正並在8月28日電示顧祝同，以「西北事應統盤籌劃，以暫緩為宜，故暫不實施，請兄專心在東南主持。」參見「蔣中正電顧祝同」（1938年8月28日），〈領袖指示補編（十三）〉，《蔣檔》，典藏號：002-090106-00013-218。

<sup>27</sup> 第十戰區至1940年5月15日撤銷。參見劉鳳翰，《抗戰期間國軍擴展與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4年），頁63。

<sup>28</sup> 1944年豫湘桂作戰中，蔣鼎文擔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卻完全無法承擔應敵重任。蔣中正任在日記中深自反省其用人之不當：「莫如高級將領之粗拙無能，尤其是舊有將領，不自知其無能，而又自以為有資格之舊部，非予以重要位置，則不甘心。余不能以為事擇人，亦視其資格與關係任命，此今日蔣鼎文在第一戰區之所以敗事也。」參見《蔣中正日記》，1944年5月6日。

<sup>29</sup> 關於熊式輝代表團在美期間的詳細經過，最新也最完整的研究參見齊錫生，《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年），頁25-30。

<sup>30</sup> 「蔣中正電孔祥熙何應欽」（1942年2月23日），〈領袖指示補編（四）〉，《蔣檔》，



陳誠的日記裡，提供了有關這盤人事布局的諸多線索，當蔣中正決定熊式輝及曹浩森的調動後，最初的考量是由陳誠或顧祝同接任曹的軍政部政務次長職務，但陳誠在第一時間即以「修養不夠、不能適合（軍政部）現在環境、恐增加長官麻煩」等理由拒絕。<sup>31</sup> 如此接任人選就只剩顧祝同一人，當時重慶統帥部較擔心的是第三戰區內川軍等地方軍系將領難以統御，顯示其最主要的考量還是人和問題，在退而求其次的情況下，決定由重慶衛戍司令劉峙來接替顧祝同之職。<sup>32</sup>

然而，消息一出，各方雜音不斷，多位戰區司令長官皆對劉峙出掌第三戰區表示異議，顯見劉峙的作戰指揮能力難符眾望，如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即對劉峙的表現頗多微詞。<sup>33</sup> 而陳誠聽聞劉峙接任的消息後，在與友人的私下談話中亦打趣道：「如劉一去，恐敵便來。」<sup>34</sup> 最終蔣中正在官邸會報對與會眾人坦言，黨政要員皆以現時第三戰區重要，強烈反對劉峙前往，蔣繞了一圈還是希望由陳誠前往第三戰區，並可由李宗仁轉任陳的第六戰區司令長官職務，但陳誠立刻表示桂系在鄂北徵糧拉伕，民怨四起，如果李宗仁一旦接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恐有激起民變之可能」，陳誠希望以孫連仲或吳奇偉接替其職，但蔣又不予贊同。<sup>35</sup>

---

典藏號：002-090106-00004-144。另關於熊式輝出任軍事代表團團長的詳細過程，參見熊式輝，《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頁320。

<sup>31</sup> 陳誠拒絕的理由頗值玩味，重慶軍政各界皆知陳誠與何應欽向來不和，蔣要陳居何之副手，當然會引起陳的反彈。參見《陳誠先生日記》，第1冊（臺北：國史館，2015年），1942年1月7日，頁344。

<sup>32</sup> 當時重慶統帥部的考量是：「惟三戰區之唐式遵太不自諒，無適當人選可接顧之任務。」參見《陳誠先生日記》，第1冊，1942年1月7日，頁344。

<sup>33</sup> 李宗仁認為：「抗戰戰場上表現最壞的要算是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劉峙，劉在河北潰敗時，曾受到撤職查辦的處分，但是不久蔣先生又重用劉峙。據說，某次蔣夫人曾向委員長進言說：『外邊閑話很多，劉峙恐怕不能再指揮作戰吧？』蔣先生說：『劉峙指揮作戰是不行，但是那個人有劉峙那樣絕對服從？』結果還是用了。蔣先生所喜歡的便是像劉峙那樣『絕對服從』，自己毫無主張的庸才，因此，國軍戰績也就不易表現了。」參見李宗仁，《李宗仁回憶錄》（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550。

<sup>34</sup> 《陳誠先生日記》，第1冊，1942年1月7日，頁344。

<sup>35</sup> 《陳誠先生日記》，第1冊，1942年1月18日，頁345。

在這起人事布局裡，將早已擔任過省主席及戰區司令長官的顧祝同，轉任軍政部次長一職，不僅在國府的官場文化中頗為罕見，對顧而言亦屬屈就。然此舉實為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在軍事委員會內部所規劃的人事調整方案中，是由顧祝同擔任軍政部部长，何應欽此後專任參謀總長職。從1930年3月起何應欽即出掌軍政部長，至此時已歷十二年，在軍政部的影響力盤根錯節，部內腐化的情況十分嚴重，蔣為顧全何應欽的面子，藉由調動資歷與其相當的顧祝同出任政次，暗示何自行辭去軍政部部长職。<sup>36</sup>

然而，沒想到何應欽對此竟全無反應，軍事委員會內軍令部長徐永昌、軍令部次長劉斐等人轉述陳誠的說法，皆以為何太不識趣，卻又都無可奈何。<sup>37</sup>最終，在何應欽並無辭意及反對劉峙接任的巨大阻力下，只有熊式輝與曹浩森兩人異動，曹的軍政部政次職位改由在航空委員會任內，因貪瀆案被革職的錢大鈞接任，顧祝同等一眾戰區司令長官，依舊不動如山。<sup>38</sup>

## 肆、重慶統帥部對第二十三集團軍高階人事的調動

1937年廬溝橋事變爆發，全國各軍系一致發出團結對外、抗日禦侮的愛國呼聲，主動爭取開赴前線作戰。軍事委員會於8月中旬任命劉湘為第二路預備軍司令長官，下轄兩個縱隊，第一縱隊司令鄧錫侯、副司令孫震，第二縱隊司令唐式

<sup>36</sup> 「陳誠呈蔣中正」（1941年），〈中央軍事機關人事（三）〉，《蔣檔》，典藏號：002-080102-00019-018。陳誠在日記亦提到他向蔣中正一再強調如調顧祝同至軍政部，應任其為部長。參見《陳誠先生日記》，第1冊，1942年1月11日，頁345。

<sup>37</sup> 據徐永昌在日記中的說法：「為章（按：軍令部次長劉斐字）述陳辭修（陳誠）云，關於軍政部，何敬之（何應欽）早應辭職，委員長令顧墨三任次長，即令接部長之意，特何不識趣耳，請為章如何設法，促其明瞭。為章以為礙難接受此建議，……又述何敬之除痛惡陳辭修外，並不喜馮煥章（馮玉祥）、李德鄰（李宗仁）、程頌雲（程潛），以為程、李與其資格相將或且上之云云。官場直如戰場，唯作官的尚不如作戰的有風度。」參見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6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1942年1月22日，頁322。

<sup>38</sup> 關於錢大鈞在航空委員會的貪瀆案件，參見張世瑛，〈蔣中正與戰時軍法體制的執行——以抗戰中期的三起貪污案件為例〉，《國史館館刊》，第55期（2018年3月），頁11-19。

遵、副司令潘文華。劉湘協調川中各部共派出十一個師出川抗戰，投身八一三淞滬會戰，南京保衛戰結束後，出川抗戰之川軍再改組為第二十二及第二十三兩個集團軍。<sup>39</sup>

1938年1月20日第七戰區司令長官兼第二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劉湘病逝於漢口，劉湘的死對於川軍的影響既深且鉅，此後川軍內部再也沒有出現像劉湘這樣既能與南京分庭抗禮、又可團結四川各派系的領導人物。唐式遵於1月17日繼任第二十三集團軍總司令職，下轄第二十一軍、第五十軍及第二十三軍。唐式遵自兼第二十一軍軍長、郭勳祺為第五十軍軍長及潘文華為第二十三軍軍長。<sup>40</sup>第二十三軍一直是由潘文華所掌握的基本部隊，1938年1月底潘文華返回四川後，由一四八師長陳萬仞代理第二十三軍軍長職務；武漢會戰結束後，第二十三集團軍再次整編，將原先轄下的三個軍，縮減為第二十一軍及第五十軍二個軍，陳萬仞改調為第二十一軍軍長。

在淞滬會戰中，國軍前後動員五十萬中央軍精銳雲集於此，會戰結束後，中日交戰的焦點移至華中的徐州及武漢地區，第三戰區成為暫時遠離前線烽火的另一個後方，直到1942年中的浙贛會戰，第三戰區都沒有再出現大規模的戰事。自顧祝同接任司令長官一職後，第三戰區轄下的主力部隊為第二十三、第三十二、第十及第二十五等四個集團軍，司令長官分別為唐式遵、上官雲相、劉建緒及陳儀。除了第十集團軍在1944年4月因應鄂西地區戰時形勢，改調至第六戰區的戰鬥序列外，幾乎在戰爭八年期間，這四個集團軍都一直隸屬於第三戰區的編制之下，其中又以第二十三集團軍的人事狀況最為穩定，但川軍的封閉特性，卻也讓顧祝同傷透腦筋。

早在1939年7月，顧祝同就曾向蔣中正大吐苦水，大打第二十三集團軍的小報告，抱怨該集團軍：「過去種種不良惡習，迄今猶未盡除，封建觀念甚深，對外不肯廣攬人才，即有少數亦屢屢掣肘，不令發揮其才能，此外動輒小題大作、

<sup>39</sup> 喬誠，〈劉湘出川抗戰前後〉，《川軍抗戰親歷記》（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4-5。

<sup>40</sup> 潘文華雖然掛名第二十三軍軍長，實際上並未到任，由陳萬仞代理軍長之職。這是因為南京保衛戰結束及劉湘死後，一部分川軍將領鄧錫侯、王纘緒、潘文華、劉文輝等部返回四川。參見曹劍浪，《國民黨軍簡史》，上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4年），頁356。

越級陳訴，妄發通電，互相攻訐。」<sup>41</sup> 此電出於顧祝同託戰區川籍幕僚官全斌回川一趟，物色堪任副師長職及各級參謀人員，以備遴用，但事機不密，被川軍知道後群起抗議，最後迫使顧不得不打消此一念頭。

抗戰期間第二十三集團軍高層人事的異動，最主要有兩起，皆為集團軍內高階將領的任免案。第一起是1940年初，時任集團軍副總司令兼第五十軍軍長的郭勳祺。總司令唐式遵電請蔣中正將郭勳祺予以免職，指控郭「跋扈貪污，不盡職守」，指其在冬季攻勢中，第五十軍擔任右翼兵團，卻未遵照作戰命令，並在攻占茶山前進陣地後即觀望不前。唐自稱親赴前線督軍，郭仍然遲滯逡巡，不聽指揮，經顧撤去其第五十軍軍長兼職後，不但未能感悟，甚至暗中鼓動部隊騷亂，唐認為若仍將其留在集團軍內，猶如一顆不定時的炸彈，故請顧將其副總司令職一併撤去，以肅軍紀。<sup>42</sup> 當然，作戰不力只是表面上冠冕堂皇的理由，還因郭勳祺與潘文華都是四川仁壽縣人，兩人不僅有同鄉之誼，郭常期追隨潘氏，係潘最得力的助手、親信。唐式遵欲拔去郭的職務，可能也有剪除潘文華在第二十三集團軍殘餘勢力的意圖。<sup>43</sup>

而郭勳祺被免職返回四川後，還發生一段向不為人所知的插曲。戴笠在同年3月密報蔣中正，軍統局密電組截獲一則署名第五十軍全體官兵致劉湘夫人的電文，指郭勳祺遭唐式遵所忌，陰謀使其去職，請劉湘夫人嚴正警告唐式遵。蔣中正將此情報轉知顧祝同後，顧表示的確是因為郭勳祺指揮失當撤職，咎由自取，並非唐之陰謀，郭離職後轄下部隊亦無任何異狀，認為此事純係少數有心人之捏造。<sup>44</sup>

<sup>41</sup> 「顧祝同電蔣中正」（1939年7月20日），〈一般資料—呈表彙集（八十九）〉，《蔣檔》，典藏號：002-080200-00516-151。

<sup>42</sup> 「唐式遵電蔣中正」（1940年1月3日），〈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九十七）〉，《蔣檔》，典藏號：002-080200-00524-064。

<sup>43</sup> 亦有一說，郭勳祺一向政治態度左傾，自1926年起即與國民黨左派及共黨人士來往，1938年初劉湘死後，郭在皖南等地與中共新四軍往返密切，為重慶中央所忌，這或許是各方皆欲去郭的一個原因。參見喬誠、楊續雲，《劉湘》（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年），頁292。在此特別感謝匿名審查人對於此項史料的指點。

<sup>44</sup> 「顧祝同電蔣中正」（1940年3月12日），〈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一〇四）〉，《蔣檔》，典藏號：002-080200-00531-012。

第二起的調動是針對第二十一軍軍長陳萬仞而來，1942年初，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決定將陳萬仞升任為該集團軍副總司令，原缺由另一支川軍郭汝棟部的二十六師師長劉雨卿遞補。<sup>45</sup> 然而這次的調整卻引起陳萬仞的強烈反彈，據顧祝同表示：「陳極為不滿，肆意詆毀戰區長官及中央當局，刻且變本加厲，對唐式遵與中央關係力爭挑撥離間。」<sup>46</sup> 陳萬仞原出身於川軍劉成勛部，直到1933年後才投向劉湘，並非劉湘的嫡系人馬，在第二十三集團軍這個以劉湘系統改編而成的部隊裡，不免遭到唐式遵等人的排擠。<sup>47</sup> 而陳萬仞一再抗爭未果後，亦採取郭勳祺的方式返回四川原籍。

郭勳祺及陳萬仞在第二十三集團軍中的地位，可說僅在唐式遵一人之下，兩人對此事的反彈，主要是針對唐式遵而來，這兩起人事紛擾比較像是川軍茶壺裡的風暴，即使是當事人也沒有將此事視為顧祝同試圖排除異己的動作。過去的研究中往往將中央及地方軍系，各自視為上下一致的利益團體，重慶中央不斷試用各種人員調動、整編及混編等方式，其目的就是要吃掉地方部隊。然而從第二十三集團軍的例子裡，顯示地方軍系內部也絕不是鐵板一塊，同樣存在著各種人際網絡的複雜關係。而郭勳祺與陳萬仞兩人在被免職後，雖然離開皖南駐地，返回四川故里，但仍與第二十三集團軍舊部時有往來，在接下來的一四八師及一四四師師長派任案中，他們仍持續發揮互通聲息、煽風點火的作用。<sup>48</sup>

## 伍、明升暗降？一四八師師長潘左調職風波

一四八師師長潘左，四川永川人，行伍出身，早年經歷不詳，自1925年投身

<sup>45</sup> 「顧祝同電蔣中正」（1942年2月4日），〈領袖指示補編（十六）〉，《蔣檔》，典藏號：002-090106-00016-001。

<sup>46</sup> 「顧祝同電蔣中正」（1942年3月25日），〈領袖指示補編（十六）〉，《蔣檔》，典藏號：002-090106-00016-071。

<sup>47</sup> 黃應乾，〈四川二劉之戰始末記〉，《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5輯（成都：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委員會，1979年），頁150-165。

<sup>48</sup> 為求行文簡練及統一，本文在出現師以上（軍、集團軍、戰區）的軍隊編制時，均於番號前統一加上「第」字，師（含）以下（旅、團、連）則統一不加「第」字，以示區別。



川軍軍旅起，就一直在劉湘所部麾下。<sup>49</sup> 潘氏經歷最早見諸於軍事委員會人事部門的正式任官紀錄，係1935年初剿共戰事期間，紅軍自湖南、貴州一路退竄至四川，國軍能否在四川有效堵截共軍，成為剿共戰事能否成功之關鍵。於是蔣中正授命劉湘出任四川剿共軍總司令，將四川各軍重新編組為剿共第一至第六路軍，唐式遵為剿共第五路軍總指揮，潘左出任第五路軍獨立四旅旅長，次年3月晉升陸軍步兵上校，這是潘左軍旅生涯中展露頭角的起點。<sup>50</sup>

1938年初，一四八師長陳萬仞代理潘文華離開後的軍長職務，原任一四八師師長職務，陳萬仞拔擢潘左出任，對潘左而言，陳萬仞無疑有著知遇之恩。<sup>51</sup> 從1938年7月2日潘左就任師長職起，至1943年底為止，在第二十三集團軍裡，潘左已是任職時間最長的師長，抗戰期間兵馬倥傯、人事更迭不斷，類似像潘左這樣不動如山、久居同一職務的情況，實屬罕見。1943年底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終於決定更動第二十三集團軍的部分師長職務，最主要的目標就是潘左。據顧祝同

<sup>49</sup> 關於潘左最早的人事資料，生於1894年（任官名簿原始記載為民前17年）6月17日，四川永川縣人，學歷登記為四川陸軍弁目隊。大陸方面的文史資料多記載其為四川陸軍速成學堂畢業，這應該是可信的，不過在軍事委員會銓敘廳的人事履歷裡，並未記載四川陸軍速成學堂該項學歷。詳見軍事委員會銓敘廳編，《陸海空軍軍官佐任官名簿》，第1冊，「陸軍步兵上校（1,105員）」（南京：軍事委員會銓敘廳，1936年），頁146；劉國銘主編，《中國國民黨九千將領》（天水：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1993年），頁799。另據大陸方面多篇文史資料的說法，潘左與劉湘為四川陸軍速成學堂的同學，與劉湘一起分發至陸軍三十三混成協擔任見習官，此後一直追隨劉湘，是劉湘系的骨幹。參見田一平，〈以劉湘為中心的反蔣秘密組織——武德勵進會〉，《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33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7-11；曹善群、向廷瑞，〈四川陸軍講武堂概況〉；王少游，〈在四川陸軍小學的一段回憶〉，《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37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105-110、111-125。

<sup>50</sup> 關於川軍出川抗戰的詳細經過，參見晏道剛，〈追堵長征紅軍的部署及其失敗〉，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圍追堵截紅軍長征親歷記》，上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頁12；「四川剿共軍序列表」，《圍追堵截紅軍長征親歷記》，下冊，頁387-392。

<sup>51</sup> 原先第二十三軍內的高階將領，如一四七師師長楊國楨、獨立十五旅旅長穆肅中、獨立十七旅旅長黃岡皆隨潘文華返川。可以合理的推測，由於潘文華的離開，帶走了一批效忠於他的嫡系人馬，使得第二十三軍出現一次大規模的人事洗牌，也讓潘左有了獨當一面、出任師長的契機。參見郭卿友主編，《中華民國時期軍政職官誌》，上冊（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956；姜克夫，《民國軍事史略稿》，第3卷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頁212。

致蔣中正的報告中指稱，這次針對川軍的人事調整，實有其不得已的理由。1942年6月起，日軍為報復美軍4月18日空襲東京，並意識到中國東南沿海機場，對日本本土安全的威脅，發動席捲浙江全境的浙贛戰役，這是戰時日軍對第三戰區最猛烈的一次攻擊行動。會戰結束後，顧祝同將戰區內的各部隊分批後調整訓。<sup>52</sup>經過近半年的休整補充後，在第三戰區所擬的各部戰力評估報告中，以一四四師及一四八師「戰力頗劣且紀律蕩然」，被評定為最差的一級。顧在與唐式遵商議後，決定更換這兩個師的師長，1943年9月7日發布潘左升任第二十一軍副軍長，隨後再轉任第五十軍軍長，遺缺則由一四八師副師長廖敬安接任。<sup>53</sup>

潘左調職的消息傳開後，一四八師內部迅即展開各種串聯行動，希望顧祝同能收回成命。10月11日，一四八副師長廖敬安、參謀長雷伯涵、團長饒正鈞、林光裕、鄧仲侯聯名密電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高參、一四四師前任參謀長胡秉璋，請其向顧祝同轉達一四八師全體官兵希望潘左留任的心聲：「聞師長即將調升副軍長後，群情惶惑，咸表憂慮，蓋職師長獻身黨國，公忠服從，進退升降，固非所計。惟全師官兵受其薰陶，愛戴至深，果成事實，官兵精神勢將因之渙散，無形解體，功虧一簣，至甚痛惜！」<sup>54</sup>

這封電文主要訴之以袍澤之情，不捨潘左離開，卻無法解釋一四八師官兵為何會對看似平常的內部人事升遷，有如此強烈的反應。尤其此次調動，從表面上來看純屬一四八師內部的正常輪替，潘左升任副軍長，由已擔任該師副師長四年之久的廖敬安接任師長職，再從三位團長中挑選一人升任副師長，實難謂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此次的人事調動命令，有任何打壓地方軍系的企圖。三天後，同一批人再次密電胡秉璋，這次的電文就暴露出背後複雜的人際網絡關係，強調將潘

<sup>52</sup> 關於浙贛戰役的最重要研究，參見張力，〈從決戰到棄守：浙贛戰役衢州戰役蔣中正的抉擇〉，收入陳紅民主編，〈中外學者論蔣中正〉（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109-122；賴繼年，〈浙贛會戰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賴繼年，〈浙贛會戰新探〉，《抗日戰爭研究》，2011年第1期（2011年2月），頁63-71；張世瑛，〈隱蔽出擊抑或消極避戰—國軍第三戰區面對浙贛會戰的部屬與肆應〉，《國史館館刊》，第67期（2021年3月），頁37-90。

<sup>53</sup> 葉惠芬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56冊（臺北：國史館，2011年），頁577。

<sup>54</sup> 「廖敬安等電胡秉璋」（1943年10月11日），〈一四四師叛變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5018230601/0032/013.13/6021。



左調走，「必係總（司令）唐（式遵）最後之掙扎」，此事能否有轉機之關鍵，即在川軍同人在第三戰區長官部內的運作，及前第二十三集團軍副總司令郭勳祺等人在四川的遙相呼應、互為聲援。<sup>55</sup>

胡秉璋在收到電文後，迅即致信顧祝同，傳達一四八師官兵留任潘左之意，從這封信裡可以看出胡是希望扮演一個和事佬的角色，解開雙方的誤會。他建議顧直接召見潘左或派員前往勸慰，「以釋其惑」，而讓潘左及一四八師官兵不惜抗命的「惑」，在胡秉璋來看，癥結在於不相信這是單純的提拔好意，而是唐式遵企圖搬開潘左這顆大石頭的陰謀，認為顧祝同純係遭到唐式遵的利用。<sup>56</sup>

從目前所有公開的檔案史料中，尚無法找到任何唐式遵主導此事的證據，這或許會是一個永遠各說各話的懸案。但比起事實的真相更值得追問的是，為何一四八師官兵會將矛頭對準自己人，川軍的頂頭上司唐式遵？在第二十三集團軍裡，潘左是任職時間最長的師長，唯一一個比他在同一職務上待得更久的就是總司令唐式遵，在民國時期地方軍系講究鄉土地緣的組織文化裡，指揮官與部屬之間一直是一種榮辱與共的緊密連結關係。但一四八師官兵對於唐式遵充滿敵意的態度，顯然挑戰了這種看法。<sup>57</sup> 然而，自抗戰以來第二十三集團軍內部針對唐式遵的各種軍情報告，早已流露出上下之間毫無互信基礎的蛛絲馬跡。1940年底時任第二十三集團軍副總司令郭勳祺即因一起兵站監理人員的走私案件密報蔣中正，指唐式遵「素性愛錢，對部隊竭盡刮削之能事」，並且

<sup>55</sup> 「一四八師全體官兵電胡秉璋」（1943年10月14日），〈一四四師叛變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號：B5018230601/0032/013.13/6021。

<sup>56</sup> 「胡秉璋致顧祝同密函」（1943年10月13日），〈一四四師叛變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號：B5018230601/0032/013.13/6021。

<sup>57</sup> 民國時期地方軍系始終是圍繞著個人關係為最主要的結合，軍、師長等部隊指揮官往往是部隊認同的核心。參見Hsi-sheng Ch'I, *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 1916-192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36-39. 更極端的例子，則像是湖南李雲杰的部隊。李為湖南嘉禾人，所部官兵清一色為嘉禾人，各級官長幾為李姓人士，部隊講話全為家鄉土語，外縣人不知所云，可說是不折不扣的子弟兵。李雲杰平日剋扣士兵的薪餉，且毫不諱言，對官兵們說是作為應酬活動費，將來自己若是升了軍長，乃至總司令，水漲船高，大家均可依次升遷，豈不更好？如此一說，士兵們也就心甘情願，毫無怨言。參見雷嘯岑（馬五先生），《政海人物面面觀》（香港：風屋書店，1987年），頁100-103；張瑞德，《抗戰時期的國軍人事》，頁50-51。

「濫用私人，對軍校學生大加抑制、藉事排除。」最後郭強調集團軍內部因唐的緣故，各部隊吃空缺的情形嚴重，不只造成戰鬥力低落，且日趨腐化。<sup>58</sup> 唐、郭兩人是集團軍的最高指揮官，副總司令不惜上告御狀，大打總司令的小報告，顯示兩人關係之惡劣，已到了公然撕破臉的地步，而唐式遵在第二十三集團軍中的不得人望，亦可見一斑。<sup>59</sup>

在人事令發布後，潘左即對外稱病請假，拖延職務交接；另一方面，一四八師各級幹部則將此事鬧大到遠在重慶的最高當局。11月14日，由廖敬安領銜全體幹部分別致電蔣中正、何應欽及顧祝同，希望能讓潘左繼續留任原職。<sup>60</sup> 不過，顧祝同並未因一四八師官兵的抗爭而退讓，仍舊堅持潘左儘速辦理交接、調離原職，重慶方面則表達支持顧祝同的立場。從1943年9月至1944年1月底止，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雖曾數次派員主持監交，卻由於潘左的消極抵制，整起人事調動始終懸而未決、毫無進展。<sup>61</sup>

如果一四八師全體官兵團結一致、支持潘左，顧祝同勢必有所忌憚，在這段僵持期間，第三戰區一直試圖分化一四八師內部，爭取反對潘左的倒戈者。2月1日，一四八師幹部再次、也是最後一次聯名致電顧祝同，電文依舊重申唐式遵應為此事負起最大責任，希望顧能回心轉意讓潘左仍兼領師長職務。<sup>62</sup> 然而，這

<sup>58</sup> 這份報告的起因是第二十三集團軍的兵站副監郭緒瀚公器私用，利用軍用卡車專走私貨牟利，但郭勳祺將問題的焦點歸咎於唐式遵身上。「郭勳祺電蔣中正」（1940年12月24日），〈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九十九）〉，《蔣檔》，典藏號：002-080200-00526-139。

<sup>59</sup> 在軍事委員會侍從室第三處有關唐式遵的人事履歷登記簿裡，1944年底對於唐式遵的評語為：「渾厚勤謹、頭腦單純、愛財好貨、生活優裕，為一福將也！」在1948年9月國民大會舉行會議時四川籍代表也曾提案指唐式遵「家財富有，田園廣袤，土地面積之廣，在全川居第一。惟言語粗魯，學識甚差。」顯示在各方的看法裡，唐式遵的富裕形象深植人心。〈唐式遵〉，《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典藏號：129-200000-4000。

<sup>60</sup> 「廖敬安等電蔣中正何應欽」（1943年11月14日）、「廖敬安等電顧祝同」（1943年11月14日），〈一四四師叛變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號：B5018230601/0032/013.13/6021。

<sup>61</sup> 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在1943年12月及1944年1月曾兩次派高參李履安至浮梁主持新舊任師長交待，都因潘左稱病之故而無法舉行。「樓月致顧祝同書函」（1944年2月7日），〈一四四師叛變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號：B5018230601/0032/013.13/6021。

<sup>62</sup> 聯名通電中強調：「竊查總司令唐（式遵），蓄意宰割，以便其私，不惜抗戰力量，矇稟中樞，致有此次人事之大調動，事實確鑿，盡人皆知，對於職師師長潘左藉升遷為排斥，且知其既已年屆知非，心雖不平，然可使之有口難言。」參見「寓農墾殖公社全體致

起電文最值得注意的是聯名名單裡少了副師長廖敬安及團長饒正鈞的名字，對照其後的事態發展，顯示一四八師內部已產生鬆動，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的分化之舉，已經收到一定的成效。

自武漢會戰後結束，直到抗戰勝利，第二十三集團軍長期駐守在安徽境內的長江下游兩岸，主要肩負戰鬥任務為襲擊及阻撓日軍船艦在長江中下游的通行。其中一四八師的駐地為江西浮梁，潘左在一四八師內成立一個表面上看來是要推廣自力屯墾生產的「寓農墾殖公社」，關於這個組織的實際運作情況，目前所知極為有限，唯一可以確定的是，至遲從1940年底起，就有寓農墾殖公社在地方上的活動紀錄。這個以一四八師軍官成員為主體的組織，與浮梁的地方豪強及幫會分子合作，長期徵收及截奪稅款，實際上，潘左透過寓農墾殖公社建立一個以他個人為中心的利益交換網絡。<sup>63</sup>

1944年2月5日，潘左邀集各級幹部至寓農墾殖公社開會，四四二團團長饒正鈞並未到會。據饒正鈞三日後致顧祝同的電報中所述，當晚潘左即派出親信部隊包圍及攻擊饒部，經過一晚的激戰，饒正鈞率殘部撤出浮梁。<sup>64</sup> 接下來的一週時間，擁戴潘左的一四八師官兵在浮梁城內發動了一連串小規模的兵變行動，此時在浮梁內的兩股武裝力量，一支是一四八師，另一支是浮梁戒嚴司令樓月統率的城防衛戍部隊。8日晚潘左的副官主任唐克明率部攻擊浮梁戒嚴司令部的城防部隊，雙方激戰三小時，傷亡雖然不大，但已造成地方民眾的恐慌，最後樓月所部終於控制住局面。<sup>65</sup> 效忠潘左的寓農墾殖公社官兵甚至在衝突中，殺害了浮梁縣境內的油頗鄉鄉長等人，並大肆掠奪地方物資，連田賦徵收辦事處都被洗劫一空，鄱陽縣長丁國屏在一天內兩次急電顧祝同，請求第三戰區儘速派兵平亂。<sup>66</sup>

---

顧祝同函」（1944年2月1日），〈一四四師叛變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號：B5018230601/0032/013.13/6021。

<sup>63</sup> 「浮梁地方通訊」，《前線日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上饒，1941年9月9日，版5。

<sup>64</sup> 「饒正鈞電顧祝同」（1944年2月8日），〈一四四師叛變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號：B5018230601/0032/013.13/6021。

<sup>65</sup> 這起兵變據樓月的報告，最後逮捕作亂的一四八師士兵十餘名，送交廖敬安處置，唐克明則逃走。「樓月電顧祝同」（1944年2月15日），〈一四四師叛變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號：B5018230601/0032/013.13/6021。

<sup>66</sup> 據丁國屏的說法，叛兵行徑已是兵匪無異。參見「鄱陽縣長丁國屏電顧祝同」（1944年2月22日），〈一四四師叛變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號：

由於浮梁位處江西與安徽交界之處，地理位置重要，亂兵的失序行為已然難以收拾。江西省主席曹浩森亦致電顧祝同告急，表示效忠潘左的兩個團裡，至少已有五個連的部隊，攜帶武器潛逃至浮梁縣屬土新及疇域兩區山中，就地徵糧拉伕，嚴重影響地方治安。<sup>67</sup> 一四八師與當地城防部隊的武裝衝突，造成浮梁城內騷亂不已、人心惶惶，也驚動了遠在重慶的統帥部，何應欽於21日致電顧祝同，表達絕不姑息的強硬立場，要求顧儘快鎮壓追隨潘左的叛軍。<sup>68</sup>

顧祝同隨即下令第五十軍軍長田鐘毅及第二十六軍軍長丁治磐率部包圍浮梁叛軍。前因一四八師的內閥分裂，廖敬安率部向顧祝同輸誠，宣布服從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的號令，於2月13日正式於師部就任新職，更使得效忠潘左的部隊孤掌難鳴、難以為繼。<sup>69</sup> 在內外交迫的情況下，潘左自知大勢已去，同意將林光裕、鄧仲侯部隊交出，個人交出印信，並孤身前往安徽屯溪第五十軍軍部就任副軍長職。這起喧騰一時、甚至造成兵戎相向的抗命事件才告落幕。或許是與此事的刺激有關，一年後，潘左自殺身亡，死因眾說紛紜，死後國民政府追贈其為陸軍中將。<sup>70</sup>

---

B5018230601/0032/013.13/6021。

<sup>67</sup> 曹浩森在電文中指稱：「一四八師師長更換，抗交半年，現該部發生分化，一部去向不明，聞為廖（敬安）師長引去，另一部隨潘（左）師長進擊浮梁城內，企圖不明。」參見「曹浩森電顧祝同」（1944年2月20日），〈一四四師叛變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號：B5018230601/0032/013.13/6021。

<sup>68</sup> 何應欽在電文中明確指出：「潘左屢屢推病、抗不移交，……刻潘正調集全師武力，已有叛變企圖，浮市人心惶恐，……請密為準備。」參見「何應欽電顧祝同」（1944年2月21日），〈一四四師叛變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號：B5018230601/0032/013.13/6021。

<sup>69</sup> 廖敬安在向顧祝同的輸誠報告中，一方面將所有責任歸咎於潘左的私心自用，另一方面則是企圖清除擁護潘左的勢力，強調最主要的兵變策動者為團長林光裕所為。參見「廖敬安致顧祝同函」（1944年2月20日），〈一四四師叛變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號：B5018230601/0032/013.13/6021。

<sup>70</sup> 據顧祝同的報告，潘左是1945年5月25日在自宅自殺，由於潘未留下遺書，顧祝同推測其死因為「積勞久病、神智失常，經年參加抗戰，極其辛苦，因操勞過甚，致身體羸弱。」參見「顧祝同電函行政院報告潘左死因」（1945年5月28日），〈抗戰有功人員褒卹案〉，《國民政府》，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36000-00141-016。



## 陸、空降部隊？一四四師新任師長柏良人事紛擾

除了一四八師外，一四四師是另一個人事調動的目標。抗戰期間一四四師的主要駐地為安徽涇縣及青陽一帶，1943年時該師師長唐明昭由於表現不佳，異動傳聞不斷，顧祝同於1943年11月初發布人事命令將其撤職，遺缺由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少將參謀柏良接任。不意這起人事案一公布後，迅即引來排山倒海的反彈聲浪，不但引爆內部的武裝衝突，最後還發展成抗戰末期最後的一起整團人馬帶槍投靠汪政權的倒戈事件。

一四四師上下在聽聞將由柏良接任師長的訊息後，立即以全體官兵的名義電呈蔣中正、何應欽及白崇禧，除了抱怨一四四師在後勤補給上，一直遭到第三戰區經理單位的差別待遇外，更表達對柏良個人的強烈不滿，強調柏氏前此僅出任過一四六師政治部主任、副師長及戰區參謀等職務，「既乏主隊（官）經驗、且毫無戰陣功勳」，完全是靠逢迎拍馬、夤緣鑽營，才能獲此職務。<sup>71</sup> 11月9日更聯名致電顧祝同，希望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能體察下情，撤回柏良的人事任命。<sup>72</sup>

柏良，四川岳池人，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五期畢業。<sup>73</sup> 柏雖為川籍人士，但他與川軍的淵源不深，1937年之前一直在軍事委員會中任職，抗戰爆發後才至第三戰區擔任作戰參謀，曾於1939年下半年間在顧祝同的授命下，短暫出任一四六師副師長。<sup>74</sup> 從表面上看，顧祝同利用一四四師師長出缺的機會，任命與該師素無淵源的柏良，似乎是有意藉此落實中央化的企圖，與前此以黃埔一期王敬久接任劉建緒離任後的第十集團軍司令長官等意圖相近。<sup>75</sup> 然而，由於柏良的個人爭

<sup>71</sup> 「一四四師全體官兵電蔣中正何應欽白崇禧」（1943年11月），〈一四四師叛變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號：B5018230601/0032/013.13/6021。

<sup>72</sup> 「一四四師全體官兵電顧祝同」（1943年11月9日），〈一四四師叛變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號：B5018230601/0032/013.13/6021。

<sup>73</sup> 關於柏良的詳細履歷，參見〈柏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典藏號：129-020000-2821。

<sup>74</sup> 在軍統局的報告中，柏良此次出任一四六師副師長，曾引起唐式遵對顧祝同將手伸入第二十三集團軍內部人事的不滿。參見「賀耀組戴笠電蔣中正」（1939年8月14日），〈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九十五）〉，《蔣檔》，典藏號：002-080200-00522-065。

<sup>75</sup> 抗戰時期中央軍與地方軍系的關係，仍舊繼續推行戰前的中央化行動，所採取的策略不外

議，以及早就覬覦師長之位的一四四師四三〇團團長、時任該師副師長，在唐明昭離職後，暫代師長職務的張昌德，不斷在其間煽風點火，使得這起人事紛爭一發不可收拾。

柏良的人事令雖然在1943年11月即已發布，但他一直沒有前往一四四師師部就任，顯然因為一四四師官兵的抵制，使得柏良不敢輕易孤身涉險。顧祝同特別指派曾經擔任過一四四師副師長、現為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少將參謀的李崇書，負起調和鼎鼐之責。李在1944年1至2月期間，一再奔走於各方之間，得到張昌德承諾不會阻撓柏良的上任，張昌德甚至以全家性命擔保柏良的安全無虞。<sup>76</sup>

然而，從柏良的角度來看，張昌德根本是在玩兩面手法，對上說的是一套，對他又是另一副嘴臉。根據柏良給顧祝同的報告中指陳，早在人事令發布後，張昌德就對柏良提出兩項條件，一是到師部就職後所有事情皆不准過問，二是就任兩個月後即稱病辭職，並推薦由張代理師長之職。柏良認為李崇書等人都被張昌德所矇騙，他「不欲受其挾持，彼輩又顛倒是非」，所以才不願意輕率就職，反落入張昌德的控制之中。<sup>77</sup>

除了張昌德對師長職位的虎視眈眈外，柏良個人極具爭議的行事風格，也是他遭到川軍上下抵制的重要原因。1943年4月國民政府公布施行「出征抗敵軍人婚姻保障條例」，規定國軍士兵凡出征期間，妻子不得單方面提出離婚或解除婚約，如果出征戰士之妻與他人通姦或重婚者，均有加重處罰的規定。這個條例的制定，很明顯是要保障出征在外的軍人權益，避免發生配偶「兵變」，導致軍心士氣的渙散。這也反映了戰爭對於婚姻與家庭關係的衝擊，以及私領域的問題又會如何倒過來影響公領域的運作。<sup>78</sup>

---

派遣黃埔出身的幹部到各地方部隊，收編或拉攏地方軍系領袖，或利用新編和混編的方式推動部隊的中央化。參見張瑞德，《抗戰時期的國軍人事》，頁113-117。

<sup>76</sup> 「李崇書電盧旭溫鳴劍轉顧祝同」（1944年2月6日、7日、29日），〈一四四師叛變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號：B5018230601/0032/013.13/6021。

<sup>77</sup> 「柏良電顧祝同」（1944年3月3日），〈一四四師叛變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號：B5018230601/0032/013.13/6021。

<sup>78</sup> 1920年代中共內部由於革命同志之間的戀愛關係，嚴重影響到政治與革命的運作，實際參與其中的鄭超麟就意識到戀愛與政治之間有密切的關係，鄭提出一個非馬克斯主義的論點：「大概沒有戀愛的黨內鬥爭，雙方比較冷靜些、客觀些，理論性多些，有節制些；凡

在這起事件中，另一個在其間穿針引線的重要人物是曾任一四四師參謀長的胡秉璋，他與柏良的交惡，據胡個人的說法，柏良曾誘拐胡的髮妻拋夫棄子與其同居，礙於柏良為長期追隨顧祝同的部屬，才隱忍下來。胡秉璋坦言：「柏良被川軍遺棄，原因大半為其不擇手段，慣誘同事妻妾。」話鋒一轉，胡也不落痕跡地點出顧祝同的連帶責任：「一般均以為柏良為鈞座舊人，怕惹出政治問題，否則早已為人戕害矣！」<sup>79</sup> 雖然柏良一再否認他有誘拐胡妻之情事，純係胡的誣陷之辭，在兩造各說各話下，此事最後不了了之。但柏良個人私生活的不檢點，以致不得人望，顯然是他遭致各方難以明言、卻堅決抵制的幕後真正原因。

這場新任師長遲遲不敢上任的僵局，也驚擾到重慶當局，蔣中正在2月15日電示顧祝同密切注意事態發展。<sup>80</sup> 一週後，何應欽另電顧祝同，傳達據蕪湖軍統人員的情報，蕪湖汪政權地方組織已掛出「歡迎渝軍一四四師全體官兵參加和運」標語，並提醒顧祝同嚴密緊盯張昌德部下一步的行動。<sup>81</sup> 此時張昌德部在駐地拉伕徵糧的亂象，也讓涇縣民眾惶惶不安，集體向顧祝同陳情。<sup>82</sup> 在2月中旬至3月上旬間，張昌德多次致電顧祝同，表達絕無貳心之意，但第三戰區內部情報顯示，張部已有不穩跡象，顧祝同指示第二十一軍軍長劉雨卿等部監視張部。軍事委員會於3月底通令將張昌德本兼各職一律撤免，將一四四師調往皖南旌德整訓，並密令第二十三集團軍副總司令陶廣率部至旌德監視。但張昌德還是在4月下旬突破第二十一軍一四五師、一四六師及一四七師等部的包圍圈，率領四三〇團約二千餘人倒戈投向汪政權陣營。<sup>83</sup>

---

是狂熱的，過火的，你死我活的鬥爭，多半有戀愛糾紛線索可尋的。」參見鄭超麟，《史事與回憶—鄭超麟晚年文選》（香港：天地圖書，1998年），頁291-292。

<sup>79</sup> 「胡秉璋電顧祝同」（1944年4月8日），〈一四四師叛變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號：B5018230601/0032/013.13/6021。

<sup>80</sup> 「蔣中正電顧祝同」（1944年2月15日），〈一四四師叛變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號：B5018230601/0032/013.13/6021。

<sup>81</sup> 「何應欽電顧祝同」（1944年2月22日），〈一四四師叛變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號：B5018230601/0032/013.13/6021。

<sup>82</sup> 「涇縣民眾代表電顧祝同陳情」（1944年2月20日），〈一四四師叛變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號：B5018230601/0032/013.13/6021。

<sup>83</sup> 「劉雨卿電顧祝同」（1944年4月27日），〈一四四師叛變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號：B5018230601/0032/013.13/6021。



抗戰勝利後，張昌德逃回四川老家躲藏。1947年3月，張昌德及隨其投降的李志千等人，被依漢奸罪起訴，張昌德遭重慶行轅緝捕歸案，同年6月在重慶槍決伏法。<sup>84</sup>

## 柒、人身政治—戰時國軍人事問題的糾結與癥結

抗戰後期美國《時代週刊》（*TIME*）派駐重慶的通訊記者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曾形容重慶中樞的用人模式：「委員長改組內閣的方法，和美國孩子玩音樂椅的遊戲一樣，琴聲一響，各人換坐別人的椅子。委員長遊戲的獨特之處，是在於椅子的數目總是一樣，遊戲的人數也總是一樣，每個人都不會很久沒有位置。委員長相信的人極少，這極少的人總是單調地輪流擔任著各種職務。…外人是很難插足的。」<sup>85</sup>

白修德敏銳地觀察出國府中樞小圈子用人的窄門現象，卻沒有能進一步闡釋其因。其實這與二十世紀初帝制瓦解，傳統價值系統的基石——君主的消失密切相關，忠君觀念隨之無所依附，整個社會的政治與道德秩序，均出現嚴重的價值危機。民國時期動蕩不安的政治環境，始終產生不出一個穩定而具有合法性的政治領導中樞，來取代昔日皇帝的角色。從政者無所依憑，於是轉而追隨個人，忠的觀念也慢慢地從以往的「忠君」，退化成「忠主」。如同論者所言，其實儒家思想裡「忠」的原始含意，本來就泛指一切人與人之間的盡責與信任，這兩者間並沒有置換上的困難。<sup>86</sup> 忠的觀念在民國政治舞台上的退化，也可以說是一種還原，只剩下個人與個人之間人身政治的私誼結合，而民國時期派系政治的盛行，這未始不是一個重要的思想背景。

<sup>84</sup> 「陳誠電蔣中正」（1947年3月3日），〈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一一一）〉，《蔣檔》，典藏號：002-080200-00538-011。

<sup>85</sup> 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賈安娜（Annalee Jacoby）著，林亦慈編譯，《中國驚雷》（臺北：大旗出版社，2018年），頁155。

<sup>86</sup> 王克文，〈陳公博為什麼追隨汪精衛投敵—民國時期政治忠誠觀念的個案研究〉，收入南開大學歷史系中國近現代史教研室編，《中外學者論抗日根據地—南開大學第二屆中國抗日根據地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檔案出版社，1993年），頁572-573。

關於蔣中正在領導統御上所採行的「人身政治」，譬如好發手令越級指揮，試圖以士氣、人心取代制度：「只有經過他的身提面命，對方才覺得責無旁貸，很多超過常理以外的任務，能否確實執行不說，首先也只有委員長手諭或面諭才能指派得過去。」<sup>87</sup> 有關蔣中正人身政治的探討，已有眾多研究闡釋，在此不予贅述。<sup>88</sup> 而在本文所討論的案例裡，雖然實際狀況各不相同，但可以確定的是「人」的因素，成為這幾起人事案中最大的絆腳石。只有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才有權柄調動各戰區司令長官，但蔣中正要調動之前，仍然要尊重甚至維護何應欽、蔣鼎文、劉峙等老將的面子與尊嚴，蔣中正也知道蔣鼎文：「自以為有資格之舊部，非予以重要位置，則不甘心。」但不給稱心滿意的名位，這些人又要鬧事。至於身兼參謀總長及軍政部長等要職於一身的何應欽，早已是軍事委員會眾人眼中既無能、又總想把持事情的障礙物。<sup>89</sup> 然而，蔣中正始終顧全其面子，在發出以顧祝同出任軍政部政務次長的訊息後，重慶政壇人士都知道這是要何應欽自行請辭之意，奈何何應欽從頭至尾「全無覺悟」，好像跟他一點關係都沒有，蔣中正也只好就此作罷。<sup>90</sup>

至於第三戰區內部第二十三集團軍的案例，除私人關係的人身結合外，還牽涉到部隊駐防所產生的後遺症。武漢會戰是中日戰爭及國府戰時體制的一大分水嶺，武漢會戰前，戰爭尚未形成持久戰的態勢，但在武漢會戰結束後，軍事委員會撤退至重慶大後方，鞭長莫及，戰爭演變為持久戰。國軍的戰略構想是以時間及空間拖垮日軍，1940年初冬季攻勢作戰結束後，更徹底放棄主動出擊的念頭，蔣中正將所有的軍隊散到各地駐守，國軍的心態從野戰部隊變成駐防的守備軍，於是變得愈來愈趨於保守，保存實力成為首要考慮。根據齊錫生的看法，只要一支部隊長期在一個固定地點駐紮，就會出現軍紀敗壞現象，而

<sup>87</sup> 黃仁宇，《地北天南敘古今》（臺北：時報文化公司，1991年），頁123。

<sup>88</sup> 最重要的研究參見張瑞德，〈遙制—蔣中正手令研究〉，《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5期（2005年10月），頁27-49。

<sup>89</sup> 徐永昌觀察道：「何（應欽）無能而欲把持，宜乎百事之不舉矣。」參見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7冊，1944年8月1日，頁393。

<sup>90</sup> 徐永昌就發現蔣雖然在各個場合聲色俱厲，一再地拍桌子大罵，但仍是聽者藐藐，尤其是何應欽，這四個字是徐對何的形容，認為何對蔣的訓話，好像從來都是蠻不在乎。參見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7冊，1944年7月21日，頁381。

且時間越久，腐化和頹廢的程度就越高，這個長期性的腐蝕過程，最終感染了絕大多數的國軍部隊。<sup>91</sup>

國軍將領中雖有少數人注意到部隊長期駐防、不求進取的弊病，卻未能改變重慶中樞的決策。如江西省主席熊式輝於1941年5月31日在重慶黃山舉行的最高軍事幹部會議，會中張治中提議兩案，即今後戰區司令長官不再兼省主席，其次各戰區司令長官宜互相輪調。蔣中正對此表示不以為然，但劉斐、白崇禧等人都支持張治中的看法，蔣中正最後說，這原則是對的，但必須等三、五年後方可施行，熊式輝起而爭辯，認為如果不再實施輪調制度，「竊恐三、五年後中國已無可用之將，所謂軍事專家，盡變成前清之兵備道，事事懂而事事不專。」<sup>92</sup>

陳誠更是國軍高層中最早洞悉此一保守心態之人，陳在1942年初即提到，隨著戰事膠著，各前線戰區避戰情況逐漸浮現：「原戰區序列之精神在守土有責，故以地區為名，惟行之已久，弊端百出，似應改為以反攻收復失地為主，以提高攻擊精神，並打破一切弊端。」<sup>93</sup> 陳誠還在1942年12月18日電侍從室第一處主任林蔚，囑其將其一現象轉達蔣中正，務必扭轉國軍不思進攻、只求固守的作戰態度：「欲求反攻勝利及奠定建軍基礎，首須調整戰鬥序列。考……協同不良，則為主因。……致使敵人在我戰區自由抽調部隊，集中力量，以攻擊我某一戰區，我則互相觀望，完全被動，至可慨嘆。且戰區名稱，初意重在守土有責，完全為一防守性之措置，相沿日久，養成一變相防區之觀念。今當戰略改變準備反攻之際，自應依照反攻目標，重定適合要求之戰鬥序列，既可轉變將領防區心理，提高反攻精神，復可收指揮統一協同一致之效。」<sup>94</sup>

國軍部隊長期駐防各地的弊端，除了逐漸喪失主動攻擊的作戰意識外，也因國軍後勤補給制度的不健全，多數時刻軍政部都是以發代金的方式，讓各部隊自由採買所需物資，且容許在部隊需要的前提下，開辦各種生產工廠等民生事業。

<sup>91</sup> 齊錫生，《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頁6。

<sup>92</sup> 熊式輝事後對他的直言不諱，頗為後悔，深恐得罪了蔣中正及在場的其他同僚。但他的確對國軍將領長期駐防後的暮氣沉沉，深感憂心。熊式輝，《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頁281。

<sup>93</sup> 陳誠，《陳誠先生日記》，第1冊，1942年4月13日，頁367。

<sup>94</sup>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書信集—與友人書（上）》（臺北：國史館，2009年），頁229。

潘左及張昌德的問題，就在於與駐地的利益糾纏難分。潘左在浮梁駐防多年，他所成立的寓農墾殖公社，與地方上米糧、被服、棉紗、醫藥等眾多物資供應商皆有生意往來，甚至自己也跳下來經營。許多一四八師幹部都牽涉其中，與潘左形成利益的共同體，一旦潘左離任，這個營利網絡勢必得要打掉重練，故潘左自不欲單憑一個空頭的副軍長職位，而放棄這背後龐大的利益。

事實上，自1940年起通貨膨脹開始呈現螺旋狀的不斷惡化，法幣貶值對領取固定工薪的軍公教階層所帶來的衝擊最大，戰時一位少尉排長即言：「是時軍中待遇已與無給制相去不遠。」<sup>95</sup> 大多數軍官靠吃空缺維持部隊運作及彌補虧空，高級軍官更想方設法，跳下來自己做生意。陸軍大學的資深教官周亞衛就對陳誠說，現在除了蔣中正一個人，沒有一個人不做生意。<sup>96</sup> 軍法執行總監何成濬成說：「豫南皖西之較大商業，皆握在桂系軍隊手中，商人不能經營……人民血盡淚枯，中等以下之家，莫不破產。」<sup>97</sup> 在陳永發教授的研究中，歷數國軍高層將領何應欽、蔣鼎文、湯恩伯等人都在經營各種商業活動，與民爭利，甚至公然進行與淪陷區的走私貿易。<sup>98</sup>

對於戰爭後期國軍普遍兼營商業行為的現象，今天我們很容易逕以貪污腐化、軍紀敗壞一筆帶過；然而，這樣的批評雖然不能說錯，卻是完全無視於戰時國府的窘困處境。抗戰中期擔任第五十四軍中將軍長的黃維，在一次友朋聚會中不無意氣地說：「今日如規規矩矩拿薪水，便要餓飯，而且不能作事，勢必失敗不可。反之，混水摸魚，貪污舞弊，自己肥了，大家也可沾些油水，倒是人人說

<sup>95</sup> 相對於日益微薄的薪水，派駐雲南的黃仁宇提供一個生動的對照例子，當地土匪出價7,000元收購部隊的輕機關槍，是他一個少尉四十年的薪餉總和。參見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中正日記》（臺北：時報文化公司，1994年），頁238。

<sup>96</sup> 陳誠在日記裡好幾次提到周亞衛的這番話。參見陳誠，《陳誠先生日記》，第1冊，頁517、550。

<sup>97</sup> 何成濬，《何成濬將軍戰時日記》，上冊（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6年），1943年2月15日，頁225。

<sup>98</sup> 陳永發，〈關鍵的一年——蔣中正與豫湘桂大潰敗〉，收入劉翠溶主編，《中國歷史的再思考》（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年），頁348-349。財政部一位官員即點名何應欽在老家貴州從事鹽生意，1943年一年內即獲利數億。蔣鼎文、湯恩伯在河南更是開辦工廠、霸占各種商業活動，與民爭利。參見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7冊，1944年5月24日，頁317；陳誠，《陳誠先生日記》，第1冊，1944年5月16日，頁538-539。

聲夠交情，有了問題大家包涵。這是作好不好，作壞倒好，正義掃地，是非顛倒。」<sup>99</sup> 黃維的說法或許也為潘左等人的經商行為，提供了一個人情上的解釋。然而，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既允許軍隊兼營商業，久而久之即很難區分何謂「合法」的部隊需要與「不合法」的經商牟利，一四八及一四四師最終的尾大不掉、挾眾抗爭，都與人身政治的盛行及商業利益的糾葛脫不了關係。

此外，抗戰時期的人身政治，絕非僅限於蔣中正一人，而是存在於當時國軍將領的普遍現象。由於傳統用人制度的崩解，民國時期政治人物在人身政治的施展，其實是建立在一種施恩與效忠的互惠關係上，也由於這種互惠行為是建立在個人的關係上，它在本質上僅能存在於一定範圍的人數之內，而無法無限度的擴大。戰時擔任侍從室第六組組長的唐縱，曾提到蔣中正權力行使的一個矛盾現象：「委座之權力在形式上、事務上日見集中，而在實質上（如對大員顧慮多而不能加以法律）日見降低。」<sup>100</sup> 傳神地反映了在人身政治的關係中，領導者亦須遷就於附從者的侷限性。

除了蔣中正自身外，蔣也以同樣的人身政治標準，來看待其下將領的領導統御。例如蔣對顧祝同在第三戰區的指揮表現，從他一再發出的嚴令電文來看，蔣認為第三戰區的致命傷，歸根究柢還是人的問題，尤其是圍繞在顧祝同身旁的親信幕僚：「長官部組織與人事太不健全，對於部屬與幕僚人才，兄平時太不注意，第三戰區兄應反省軍中人才究有幾人？而現任參謀長以中（按：蔣中正自稱）視之無異於傻子，實為最無能無識之人，而兄始終不能離棄，不想物色人才，只有嫖賭酒肉為能事的朋友，上下風紀之壞，以三戰區而極矣！務望於人事方面徹底改革，否則軍事國事皆將殉予若輩之手。」<sup>101</sup> 這裡以傻子形容顧所用的參謀長，甚至指顧只有吃喝嫖賭的朋友，最後還是寄望顧能在人事方面徹底改革，才能讓爛到骨子裡的第三戰區，得以起死回生。

<sup>99</sup> 唐縱，《唐縱失落在大陸的日記》（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98年），1942年10月20日，頁282。

<sup>100</sup> 唐縱，《唐縱失落在大陸的日記》，1943年5月7日，頁390。

<sup>101</sup> 「蔣中正電顧祝同」（1941年6月26日），〈領袖指示補編（十五）〉，《蔣檔》，典藏號：002-090106-00015-159。



一年後，蔣再次致電顧祝同，翻來覆去說得仍是同一套老話：「（第三戰區）長官部各級幹部精神仍極散漫，各處業務仍多敷衍了事，多數辦不通，故無形擱置，此種現象實由兄督察不嚴，負責無心所致。尤其任用一般老同鄉舊部屬，操縱權利欺瞞長官，因之戰區重要設施皆成形式化，而以三人為甚。而去年敗戰恥辱，不可為不大，不料第三戰區情形與長官部及兄本身，仍無決心悔改，……請問兄是否有心革命？決心振作以自贖？希切實覆報，並將鄒朱盧三人即日送渝候審。」<sup>102</sup>

第三戰區首任參謀長即為鄒文華，江蘇江都人，與顧祝同為保定軍校畢業的同期同學，與顧過從甚密；辦公廳主任朱華、字實秋，江蘇江都人，同樣與顧有同鄉之誼；戰區高級參謀盧旭，字覺華，也是顧的保定軍校同學，跟隨顧祝同多年。三人被稱為第三戰區的「三華」，也一直是顧祝同最為倚重的幕僚，在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的多位幕僚眼中，三人雖然不免有些暮氣，卻也不至於像蔣中正所說的「與傻子無異」，但此處反映蔣中正對於顧祝同用人方式的不滿，已到了無可忍受的臨界點。<sup>103</sup> 然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蔣中正雖然越罵越不留情面，但好像也沒有任何實質效果，三人依舊受到顧祝同的重用，直到第三戰區的裁撤。

向來是乖乖牌的顧祝同對鄒文華等三人信任有加的堅定態度，與抗戰後期蔣中正不畏排山倒海而來的輿論與學潮壓力，堅持讓不符人望的孔祥熙擔任行政院副院長等要職，其實是五十步笑百步，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在心態上並無二致。如同在第三戰區基層的一四八師及一四四師，圍繞在潘左及張昌德身邊的一群人，也同樣各自形成以兩人為中心的人際與利益網絡，究其本質，其實也都是人身政治的一種表現與延長。

<sup>102</sup> 「蔣中正電顧祝同」（1943年5月12日），〈領袖指示補編（十六）〉，《蔣檔》，典藏號：002-090106-00016-356。

<sup>103</sup> 阮修治，〈長官部辦公廳梗概〉，《上饒市文史資料》，第7輯（上饒：上饒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86年），頁3-4。

## 捌、「重人事而不重做事」——代結論

學術界一般以為戰前的地方實力派因一致抗戰的號召，而逐漸服從中央號令，卻忽略了另一個同時滋生的矛盾現象，即一批國軍軍事將領亦假借抗戰之機坐大。據論者形容，戰區制的發展，甚至形成另一種類似北洋軍閥時代、據地為王的復辟現象。<sup>104</sup>

抗戰初期，軍令部長徐永昌即感慨：「在今日，命令電報所生之效果已微，今日惟有委員長親與前方將領之電話或者有效耳。」<sup>105</sup>到抗戰後期，情況更加嚴重，劉斐曾道：「委員長感嘆無人負責辦事，實由委員長自己造成，將領驕不受命，必委員長手令，才有幾分幾的效率，派出人員必侍從參謀，此全係不運用組織，自毀機構能力。」<sup>106</sup>而在軍法總監何成濬眼中，戰時的戰區制度造成地方軍人勢力的擴張日趨嚴重：「自抗戰後，各省又漸由統一而變為割據，新式軍閥較前之北洋舊軍閥，尤為驕橫，中央威信，遠不如五年以前，無論如何措置，恐終難收圓滿之效。」<sup>107</sup>少數擔任戰區司令長官的高級將領假抗戰之機擴張勢力，而以職位為地盤，造成外重內輕，中央權威蕩然無存：「視此為千載一時良機，乘中央無暇他顧，要挾欺騙，擴張其地盤，充實其軍隊，危害黨國，破壞抗戰於無形之中，此等敗類，真擢其髮而不足以數其罪也。」<sup>108</sup>

<sup>104</sup> 王奇生，〈抗戰時期國軍的若干特質與面相——國軍高層內部的自我審視與剖析〉，《抗日戰爭研究》，2014年第1期（2014年2月），頁137；王奇生、陳默，《中國抗日戰爭史》，第4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頁304-321。

<sup>105</sup>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4冊，1937年11月20日，頁181。

<sup>106</sup>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7冊，1944年4月23日，頁286。

<sup>107</sup> 何成濬，《何成濬將軍戰時日記》，上冊，1942年3月15日，頁71。

<sup>108</sup> 何成濬，《何成濬將軍戰時日記》，上冊，1942年4月23日，頁91。另，何成濬尤其痛斥桂系勢力在抗戰期間的膨脹，認為李宗仁的第五戰區「最難應付」，中央政府對「廣西事向不能過問」，根本無法插手廣西的任何事務。何成濬，《何成濬將軍戰時日記》，上冊，1942年3月24日，頁75。類似的例證還有很多，例如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同樣指出，白崇禧才是真正擁有在廣西決定一切權力的人，雖然他身在重慶，但白是廣西黨政軍事務實際上的靈魂人物；中央連半個人都安插不到廣西，人事牢牢控制在桂系首腦的手中，甚至連陳立夫的CC系勢力都絲毫不敢伸入廣西的國民黨組織內。參見張發奎，《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頁309、324。



何成濬作為軍法執行總監，名義上執掌全國最高軍法事務，實際上何深感其權力無法貫徹，如人事方面，「各戰區軍法執行監，編制雖直隸本部，應由本部派員充任，事實上均係各戰區長官保荐，蓋各戰區長官，不完全服從中央命令者，為數較多。若中央派人前去，非借故拒絕，即事事掣肘。」<sup>109</sup> 執行過程中，戰區軍事長官更事事干涉，不能依法裁判，何成濬感嘆道：「今日各戰區司令長官，其驕橫有過於明末四鎮之黃得功、高杰、劉良佐、劉澤清等，在其範圍之官吏，倘與無私人關係，不陷之於罪戾，即排擠而去之，比比皆是，豈獨一軍法執行監耶！」<sup>110</sup>

總而論之，抗戰時期地方軍人勢力的迅速膨脹，與戰區制有著直接的關係。事實上，戰區和集團軍不僅是軍隊的組織形式，同時也是國軍各個派系在戰時的存在形式。戰區制及讓戰區司令長官兼理行政（省主席）、黨務（省黨部主委），集軍、政、黨大權於一身，難免產生新的地盤意識與割據野心。於是隨著抗戰局勢的演變，中央越來越受制於各戰區司令長官，於是乎「各戰區幾成獨立國，用人行政，均不遵照中央法令辦理，中央亦無策制止之。」<sup>111</sup> 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證實了抗戰初始鑒於中國幅員遼闊，因地制宜所設立的戰區制，不但對抗戰沒有太大的幫助，反倒造成地方勢力的坐大與割據。

戰區制度的影響極其深遠，但過去的抗戰史研究著墨甚少，反倒是當時身處其中的軍政人物看得較為透澈，留下頗多一針見血的評論。戰時曾先後隸屬於第九及第三戰區第一線戰鬥序列的第二十六軍軍長丁治磐，即認為戰區制的劃分對國軍作戰力的提升，實弊遠大利、得不償失：「我國抗日之役，畫分若干戰區，無異將一整個國家裂成若干小國，而演成聯合軍作戰之狀態。此戰區被敵攻擊而他戰區不能策動，兵力不能集中，意見不合一，故聯合軍之被擊敗，不少前例。予意戰區之制有改善之必要。」<sup>112</sup>

然而，顧祝同領導下的第三戰區，則為我們提供了另一個觀察戰區的重要面向。這位做了八年司令長官的顧祝同，顯然不屬於上述權勢滔天、與中央分庭抗

<sup>109</sup> 何成濬，《何成濬將軍戰時日記》，上冊，1942年3月25日，頁75。

<sup>110</sup> 何成濬，《何成濬將軍戰時日記》，上冊，1942年3月25日，頁76。

<sup>111</sup> 何成濬，《何成濬將軍戰時日記》，上冊，1943年8月21日，頁305-306。

<sup>112</sup> 丁治磐，《丁治磐日記》，第1冊，1939年3月24日，頁80-81。

禮的一方藩鎮，倒更像是一個處在重慶中央與轄下軍師長間的夾心餅乾。顧祝同並不是以強勢的領導風格來統御下屬，持平來說，戰時國軍高層將領幾乎都對顧的指揮統御頗為肯定，江西省主席熊式輝評價時任第三及第六戰區司令長官的顧祝同及陳誠：「顧溫厚寡言，陳淺薄持氣，前者穩重，後者浮躁。」<sup>113</sup> 丁治磐也說：「顧為人和藹，雍容大度，作事細心，約定時間見面，都會記住，有事商量，都很尊重別人意見，作戰時也很尊重參謀的建議。」<sup>114</sup> 最重要的，顧祝同能長期擔任戰區司令長官，憑藉的就是態度謙沖、善於調和鼎鼐的胸襟與氣度：

顧祝同在三戰區的權力是空的，別的戰區單純，只有日軍，他這個戰區是三國誌，除了日軍之外，還有國軍、游擊隊、葉挺的新四軍及汪政府的偽軍。且三戰區轄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福建五省，區域廣大，其中熊式輝、湖南將領劉建緒、桂系廖磊（按：後為李品仙）分任江西、福建、安徽省主席，都是大頭，難對付。顧先生八年未動，……不像其他戰區司令長官都有調動，主要就是藉顧先生的氣度來應付這種局面。<sup>115</sup>

不過，從本文中所討論第三戰區內的各類型人事任免案來看，不論是哪個職務的調整，都不免遭致各方強力反彈，最終皆是不了了之，繞了一大圈後又回到原點。從最上層蔣中正想要將顧祝同調為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或軍政部政務次長，或是顧祝同及唐式遵試圖免除郭勳祺及陳萬仞的職務，以及一四八師潘左與一四四師柏良兩人的師長任免風波，這幾起人事任免案的對象與過程雖大相逕庭，相同的是，每次的人事調整都遭遇重重阻力，最後誰也動不了誰。即使是最高統帥蔣中正，似乎也無法貫徹其意志，充分反映了國軍內部盤根錯節的人事結構問題。

人事問題為何會成為國軍決策中無法擺脫的關鍵因素？一葉知秋，第三戰區的案例或許僅是國軍人事的冰山一角，卻絕非孤例。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就曾感慨，職務所賦予的權力，不能只看冷冰冰的法條、規章與制度，而是與人的

<sup>113</sup> 熊式輝，《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頁255。

<sup>114</sup> 丁治磐口述，劉鳳翰訪問，《丁治磐先生訪問紀錄》，頁76。

<sup>115</sup> 丁治磐口述，劉鳳翰訪問，《丁治磐先生訪問紀錄》，頁77。

因素息息相關，名義上，他有權力管轄該戰區內的所有政務及黨務人員，但實際上他從未干預。<sup>116</sup> 另外在時人眼中將戰區司令長官職務權勢，施展的最淋漓盡致的李宗仁也說：「中央政府的治軍、治政，全以人為依據。」<sup>117</sup> 李宗仁看到的是重慶中央的弊病，卻沒想到別人眼中的第五戰區，與他對中央獨重人事的評論無貳，甚至更為循私謀利。或許，最能展現人事問題在國軍文化中的影響力，可從主管全國軍政人事的參謀總長兼軍政部長何應欽的身上得窺一二。何應欽曾囑咐幕僚：「對作戰不參加任何意見，對人事須經我看過。」<sup>118</sup> 國軍高層皆視此「關心人事而不關心作事」的態度，為古今中外幕僚長之奇聞。從黃埔建軍伊始，試圖打造一支「有主義、有理想」、以民眾力量為本的黨軍，隨著北伐成功、統一中國，黨軍也逐步朝向保國衛民的現代化國軍邁進。<sup>119</sup> 然而從戰時國軍內部普遍存在的人身政治的現象來看，抗戰時期的國軍離軍隊國家化的目標，似乎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sup>116</sup> 張發奎坦言：「我的政治權力有多大？名義上我有絕對的權力指揮兩廣的省政府與省黨部，可是我的權力範圍是不固定的。事實上我對地方上的黨政事務從不太過問，由第四戰區政治部同黨政部門維持聯絡。」在張發奎眼中，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如重慶統帥部於抗戰初期在桂林設立桂林行營，及1939年從第四戰區（原管轄廣東及廣西兩省）劃出廣東省另設第七戰區。張認為這都是因人設事，為了安撫白崇禧及余漢謀而設：「事實上，這個職務是不必要設置的，在中國人的政治中，人事考量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參見張發奎，《蔣中正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頁282-283。

<sup>117</sup> 李宗仁，《李宗仁回憶錄》，頁501。

<sup>118</sup> 陳誠，《陳誠先生日記》，第1冊，1944年4月25日，頁526。

<sup>119</sup> 關於黃埔建軍中思想層面的深刻探討。參見呂芳上，《革命之再起》（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頁471-479。

## 徵引書目

### 一、檔案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臺北，國史館藏）

〈朱紹良〉。

〈柏良〉。

〈唐式遵〉。

〈葛武榮〉。

《國民政府》（臺北，國史館藏）

〈抗戰有功人員褒卹案〉。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

〈一四四師叛變案〉。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

〈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七年（四）〉。

〈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七十三）〉。

〈一般資料—呈表彙集（八十九）〉。

〈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九十五）〉。

〈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九十七）〉。

〈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九十九）〉。

〈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一〇四）〉。

〈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一一一）〉。

〈中央軍事機關人事（三）〉。

〈領袖指示補編（四）〉。

〈領袖指示補編（十三）〉。

〈領袖指示補編（十五）〉。

〈領袖指示補編（十六）〉。

〈籌筆—抗戰時期（十五）〉。

《蔣中正日記》（Palo Alto, California,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 二、史料彙編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兵變》。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年。

葉惠芬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56冊。臺北：國史館，2011年。

## 三、日記、文集、口述歷史、回憶錄、職名錄

丁治磐，《丁治磐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

丁治磐口述，劉鳳翰訪問，《丁治磐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圍追堵截紅軍長征親歷記》。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

四川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四川省人民政府參事室編，《川軍抗戰親歷記》。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四川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33、37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1987年。

李宗仁，《李宗仁回憶錄》。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阮修治，〈長官部辦公廳梗概〉，《上饒市文史資料》，第7輯。上饒：上饒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86年。

何成濬，《何成濬將軍戰時日記》，上冊。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6年。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書信集—與友人書》。臺北：國史館，2009年。

軍事委員會銓敘廳編，《陸海空軍軍官佐任官名簿》。南京：軍事委員會銓敘廳，1936年。

唐縱，《唐縱失落在大陸的日記》。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98年。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4、6、7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

郭卿友主編，《中華民國時期軍政職官誌》。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0年。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84年。



- 陳明仁，《陳明仁日記》。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17年。
- 陳誠，《陳誠先生日記》，第1冊。臺北：國史館，2015年。
- 張發奎，《蔣中正與我一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年。
- 黃應乾，〈四川二劉之戰始末記〉，《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5輯。成都：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委員會，1979年。
- 馮玉祥，《馮玉祥日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
- 熊式輝，《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香港：明鏡出版社，2008年。
- 鄭超麟，《史事與回憶—鄭超麟晚年文選》。香港：天地圖書公司，1998年。

#### 四、報紙

- 《前線日報》，上饒，1941-1942年，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 五、專書

- 王正華，《抗戰時期外國對華軍事援助》。臺北：環球書局，1987年。
- 王奇生、陳默，《中國抗日戰爭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
- 王建朗，《抗戰初期的遠東國際關係》。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年。
- 丘宏達、許倬雲主編，《抗戰勝利的代價》。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6年。
- 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賈安娜（Annalee Jacoby）著，林亦慈編譯，《中國驚雷》。臺北：大旗出版社，2018年。
- 李嘉谷，《合作與衝突—1931-1945年的中蘇關係》。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
- 呂芳上，《革命之再起》。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
- 姜克夫，《民國軍事史略稿》。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 曹劍浪，《國民黨軍簡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4年。
- 張瑞德，《抗戰時期的國軍人事》。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
- 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中正日記》。臺北：時報文化公司，1994年。
- 黃仁宇，《地北天南敘古今》。臺北：時報文化公司，1991年。
- 喬誠、楊續雲，《劉湘》。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年。

雷嘯岑，《政海人物面面觀》。香港：風屋書店，1987年。

齊錫生，《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年。

劉國銘主編，《中國國民黨九千將領》。天水：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1993年。

劉鳳翰，《抗戰期間國軍擴展與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4年。

Ch'I, Hsi-sheng. *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 1916-192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Ch'I, Hsi-sheng.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1937-45*.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2.

## 六、期刊論文、專書論文、學位論文

王克文，〈陳公博為什麼追隨汪精衛投敵—民國時期政治忠誠觀念的個案研究〉，收入南開大學歷史系中國近現代史教研室編，《中外學者論抗日根據地—南開大學第二屆中國抗日根據地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檔案出版社，1993年。

王奇生，〈抗戰時期國軍的若干特質與面相—國軍高層內部的自我審視與剖析〉，《抗日戰爭研究》，2014年第1期（2014年2月）。

陳永發，〈關鍵的一年—蔣中正與豫湘桂大潰敗〉，收入劉翠溶主編，《中國歷史的再思考》。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年。

張力，〈從決戰到棄守：浙贛戰役衢州戰役蔣中正的抉擇〉，收入陳紅民主編，《中外學者論蔣中正》。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

張世瑛，〈蔣中正與戰時軍法體制的執行—以抗戰中期的三起貪污案件為例〉，《國史館館刊》，第55期（2018年3月）。

張世瑛，〈隱蔽出擊抑或消極避戰—國軍第三戰區面對浙贛會戰的部屬與肆應〉，《國史館館刊》，第67期（2021年3月）。

張瑞德，〈遙制—蔣中正手令研究〉，《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5期（2005年10月）。

賴繼年，〈浙贛會戰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

賴繼年，〈浙贛會戰新探〉，《抗日戰爭研究》，2011年第1期（2011年2月）。

